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3月15日第3期 总第12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26 期

教育专辑（三）

目录

【编者按】

大家来讨论，什么是“狼奶”？

【专稿】

何 蜀 文革时期的重庆教育

【评论】

潘祛病 “红色读物”读解（一）——革命新人斗志昂：读《新来的小石柱》

【述往】

李南央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上）

【怀人】

高嘉陵 高忆陵 我们的妈妈

【资料】

高教部《北京公社》红岩战斗队 高教部七一战斗队

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

——彻底清算十七年来高教工作上的修正主义黑线（初稿）（续完）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二战斗队 刘少奇的黑手伸向教材编辑工作一例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小米加步枪》战斗队、中宣部彻底摧毁阎王殿革命联合委员会教育批判小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改资料组：

刘少奇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根子

——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 160 例

【读者来信】

1. 阿陀自我正误 2. 庞国义纠错 3. 予庆指谬 4. 张晓良感想

【版权声明】

【编者按】

大家来讨论，什么是“狼奶”？

为什么中学的花季少女突然变成了打杀凶手？为什么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以折磨老师、同学为乐？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三大灾难？

袁伟时的回答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

那么，什么是“狼奶”？

网文说“狼奶”的成分有三：一是美化独裁、愚昧民众，二是民族主义，三是阶级斗争理论。我们想知道，这些经过高度概括的“狼奶”，在教科书里，在媒体和银幕上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狼奶”就像一棵树，有根有干，有枝有叶。那么什么是根？什么是干？什么是枝？什么是叶？

有人认为，“狼奶”不是单纯的东西，它是多种成分的混合物。比如学雷锋运动，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那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怎么分解剥离，才能把它们分开？

还有人认为，十七年的教育基本是好的，它给了老三届进取心、责任感和人生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即使在今天仍旧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

这些说法，哪些对？哪些不对？为什么？

本刊希望大家踊跃投稿，各抒己见，三五百字不嫌短，六七千字不嫌长，不求面面俱到，只要言之有物。来稿请寄：gx11946@163.com■

【专稿】



何蜀，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文革前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被剥夺升高中的权利。文革爆发时正在做临时工，文革中期进工厂当工人。文革结束后调入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其间以“自学视听生”身份考取电大语文类专科毕业文凭。1989年初，以无党派身份参与创办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期刊《红岩春秋》，一直工作到退休。曾任杂志社副主编，职称为编审。著有《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编有《昨天——2012年〈昨天〉精选》（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真相与反思——2013年〈昨天〉精选》（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现为电子刊物《昨天》主编。

文革时期的重庆教育^①

何蜀

从1966年夏至1976年秋，肆虐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重庆市的教育界造成了极大的动乱。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育被诬为“黑线专政”，遭到全盘否定，教师队伍在“批判反动权威”、“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批判黑线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中遭到沉重打击，一些优秀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大、中、小学生从“停课闹革命”到参与派性冲突的“全面内战”和“接受再教育”的“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学军”，致使整整一代青少年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同时受到“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歪理邪说的蛊惑影响，大好年华在十年浩劫中虚掷。教育，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

^① 本文是2014年重庆广益中学（民国初年创办的教会学校，毛泽东时代一度更名为重庆市第五中学）百年校庆时应约为“百年广益和百年重庆教育”论坛所写的专题论文，后结集出书时被出版社编辑全文删除。

第一节 重庆大学校长之死成“造反”导火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重庆市的教育界就成了重点。1966年6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第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和西南局5月26日决定和省委6月7日部署，坚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学校的重点是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教职员，高中以上学生也要参加运动。决定大专院校一律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中、小学教员利用暑假以区为单位分片集中进行。^①

就在这个文件下发前夕，按照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四川省委的部署，在《人民日报》6月2日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大学“陆平黑帮”^②、6月16日公开点名批判南京大学“匡亚明黑帮”^③之后，重庆市委也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于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④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并在22日的《重庆日报》上公开点名。市委还派出由一名副市长担任组长的300人的庞大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实行了文革中的第一次“夺权”，让校、系两级90%以上的领导干部“靠边站”^⑤，发动师生员工“抓郑思群黑帮”。

市委工作组找不出郑思群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足以用来定罪的大问题，便将郑思群的“海外关系”^⑥和与苏联专家的交往^⑦作为突破口，对其进行逼供。郑思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钟修文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93—94页。

^② 陆平（1914—2002），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兼校长。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写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称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彭珏云（北大党委副书记）等“压制群众革命”，“破坏文化革命”，“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6月1日批示将此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全国各报刊发表。《人民日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为陆平、彭珏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③ 匡亚明（1906—1996），时任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兼校长，1966年6月2日，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一些学生听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受其鼓舞，写出了《十问匡校长》等大字报。匡亚明认定这是右派反党的行为，组织师生反击。但其作法背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中共江苏省委按照康生批示将其停职并组织群众批判。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宣称“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

^④ 郑思群（1912—1966），广东海丰人，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八路军总部敌工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副校长兼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校教育长等，1952年起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⑤ 重庆大学校史编委会编，伍子玉主编《重庆大学校史》（下册），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127页。

^⑥ 海外关系：中共执政特别是在强化“阶级斗争”宣传之后，严格限制大陆居民与海外亲友的联系，凡在海外有亲友者，不论其有无联系，均被视为有“通敌”嫌疑，因此“海外关系”成了一种可怕的政治“污

群是当时重庆市行政级别很高的“七级干部”，革命资历远在一般工作组成员之上，对市委工作组强加给他的罪名当然不能接受，对工作组的逼供迫害愤懑已极。8月2日凌晨，郑思群被发现在工作组“监护”（关押）他的重庆大学松林坡专家招待所用剃须刀片割破颈动脉血管自杀身亡，终年55岁。

市委闻讯后，匆忙宣布永远开除郑思群党籍。因郑思群平时工作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与学生关系很好，他在市委工作组迫害之下的自杀和市委对其“鞭尸”式的无情处理，使重庆大学广大师生感到震惊和悲愤不平，由此而站到了反对市委工作组并进而反对市委的立场上。在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既定方针下，造反之火从重庆大学开始向四周蔓延。

第二节 重庆文革初期的两大事件

都发生在教育界

重庆文化大革命初期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两大事件：“八一五”事件和“八二八”事件，都发生在教育界。

因郑思群之死，重庆大学广大师生成了反对市委工作组的造反派，这在当时全国大专院校中是罕见的（大多院校中的造反派当时都是少数派）。这时，与重庆大学同在沙坪坝区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今重庆师范大学）学生中出现两派对立，反工作组一派处于劣势。其“轻骑”、“排炮”两个小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组观点占绝对优势的重庆大学师生求援。8月15日，重大数千师生前往师专声援，他们被保工作组一派群众围在暑气逼人的师专大操场上，双方展开激烈辩论，附近的师专附中（今第八中学）学生及一些工人、机关干部和居民也带着不同观点前来加入辩论或看热闹。当晚，前来解决问题的市委领导人与造反派师生严重对立，形成了重庆第一次造反派与市委领导当面争执的局面。事后，重庆造反派便将此日视为造反开始纪念日，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于8月26日成立的群众组织就取名为八一五战斗团。重庆造反派最初也统称“八一五派”。

点”，有“海外关系”者在许多方面都会受到歧视和排斥。

⑦ 中共执政初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大批苏联专家被派到中国的许多部门指导、帮助工作。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凡对苏联专家或对苏联提出意见者多被以“反苏”罪名打成“右派分子”。然而到了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展开论战，中共视苏共为“现代修正主义”之后，对苏联表示友好或与苏联专家有过交往又成了“里通苏修”、“通敌叛国”的罪行。

“八一五”事件后，重庆大学、市六中等校学生就已经在市委大门内外贴出许多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大字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成立后，分派人员到各地进行宣传。8月28日早上，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32个学生，来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他们在江北区当时的中心区老江北城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在米亭子小学校门对面墙上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题为《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引起了注意。这时，全江北区230名厂办、社^①办半工（农）半读和民办中学教师正在江北下横街小学学习点“集训”——按照市委统一布置，在区委工作组领导下，集中进行“人人过关”、“背靠背揭发”的“学习”。教师们普遍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以为又一场“反右派”运动来了，自己必须辨清大是大非，站稳立场，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作坚决斗争。当教师们发现重大八一五贴出的以“集中火力，炮轰市委”为题的大字报后，并不知道这是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在三天前重庆市委召开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出的号召，认定这个提法是“反党”的“反动口号”。于是，教师们争先恐后地积极采取“革命行动”，果断地用两条“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将那张大字报覆盖了。重大学生认为他们覆盖大字报的举动是“破坏革命的大字报”即“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行为”，要求交出“反革命”和“幕后指挥”。双方互不相让，都说对方是“反革命”。事情越闹越大，正放暑假的一些学生也跑来介入，形成了空前混乱的群体事件。

重庆市党政领导为稳定局势，便授意江北区的一些干部和群众编写印发传单、大字报，声称由“八一五暴徒”制造了“八二八”惨案^②，试图以发动群众对重大八一五进行批判来维持社会稳定，使运动“健康发展”。但是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仅导致事态扩大，激化了两派不同观点群众间的对立情绪，而且在反击造反派中，因沿袭了“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批“三家村”时的一些惯用手法，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捕风捉影，虚构编造，将这个小冲突夸张宣传为所谓“暴徒逞凶”的“惨案”，结果被造反派抓住了“造谣”的把柄，反而使围攻“八一五”的一方大失人心，使不少市民站到了同情、支持造反派方面来。

“八一五”事件使重庆大学造反派走向了社会，“八二八”事件使“八一五”

^① 指当时的农村人民公社。

^② 吴安宁《江北城“八二八”事件钩沉》，政协重庆市委学习及文史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一辑219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成为全市民众关注的焦点。再加上当时中央传媒反复宣讲并引导民众学习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痞子运动好得很”的理论，“八一五好得很”遂成为逐渐占据社会舆论主流的共识。

与此同时，一些中学被调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的高中学生也纷纷要求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有的在了解到文革形势后便自发返回学校，并纷纷开始了造反活动。

第三节 大、中学生的两次大规模上访事件

1966年8月18日以后，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公开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已在全国一哄而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迅速被卷入其中。重庆市也效法北京的样板，由市委授意，通过市学联出面，发动一些大、中学校组建起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赤卫军”，按照中央传媒热情欢呼“好得很”的北京红卫兵的做法，“破四旧”，大串联，建立各种战斗队……外地串联学生也大批来到重庆，与重庆各学校师生进行串联、交流。学校完全成了动乱的集中点和批发城。

“八二八”事件后，因重庆大学许多造反派学生在校外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批斗，9月3日夜，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趁市委领导人在师专开会之机，前去向市委提出质询，要求市委出面澄清“八二八”事件真相。因市委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以重大、师专、建工学院学生为主体的大学生造反派于9月4日提出绝食，见市委仍然不为之所动，又于4日深夜（5日凌晨）决定上京告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重庆市第一次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

重庆市的党政“一把手”任白戈因被中央报刊点名而被迫“靠边”以后，重庆党政领导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为了稳定重庆局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多次从成都来到重庆坐镇，并带来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和中共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协助重庆市委工作。按照分工，刘文珍在重庆主要抓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建设工作。1966年8月31日，在刘文珍的大力促成下，重庆五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在重庆市第七中学召开了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9月1日，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刘文珍和市委领导到会祝贺。

由于受到形势的影响，中学生红卫兵已经不再顺从上级党委的控制，其总部成员和许多基层组织都倾向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市委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问题，9月15日，重庆市委决定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与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合并”^①。

9月21日，就在《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中学生红卫兵“合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消息，并宣布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已经撤销的时候，拒绝合并的中学生红卫兵在第四十一中学（今已改还为原名巴蜀中学）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来自103个学校的代表一致抗议市委将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的作法，选出了新的临时主席团，随后又集体到人民礼堂向市委请愿。因市委迟迟不能（显然也不可能）作出使他们满意的答复，9月27日凌晨，中学生红卫兵宣布“步行上京告状”。市委闻讯后，赶紧组织许多工作人员并动员各校教师及有关家长到铁路沿线一些火车站去拦截、劝阻学生。但仍有上千学生去了北京。就这样，一个与重大八一五“并肩作战”的中学生造反派组织正式出现，而且成为重庆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紧接着，全国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重庆党政领导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教育界的动乱自然愈演愈烈。

第四节 “全面内战”中教育界遭受重创

1967年1月按毛泽东的号召“夺权”之后，重庆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建立起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围绕对革联会的态度，造反派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认定革联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应当“砸烂”，被称为“砸派”，后来更名为“反到底派”；另一派认定革联会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新生红色政权”，要坚决捍卫，这一派仍称“八一五派”。两大派从1967年夏到1968年秋展开了一场先动手后动冷兵器随后升级到使用枪炮的“全面内战”，特别是在1967年8月和1968年7月达到两次炮火纷飞的大规模武斗高潮。

在这场“全面内战”中，重庆教育界首当其冲。最早有全市两大派卷入的大

^① 鲁大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1967年3月4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翻印，1967年3月11日。

规模武斗，是发生在西南师范学院的1967年“六五～六八”事件。最先使用枪支的大规模武斗，是发生在重庆工业学校的1967年“七二五”事件。许多校舍变成了战场，许多学生变成了武士或“烈士”。当年学生们的盲目与狂热，从下面两首歌的歌词可见一斑。

重庆两大派武斗中，反到底派的重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下属有一些普通中学和中专学校学生组成的武斗组织冲杀在第一线，伤亡惨重。九一纵队的重要成员电力学校东方红战斗队创作了一首《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战歌》：

炮声隆，枪声激，风烟滚滚卷战旗。

啊，“九一”战士浴血奋战，所向披靡全无敌！

烈士血，染红旗，流血牺牲志不移。

“九一”战士心向党，誓死保卫毛主席！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踏着烈士的血迹勇敢前进！

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前进！

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九一纵队”誓与牛鬼蛇神狐群狗党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年重庆大武斗中与反到底派厮杀的八一五派中学生组织里，有名的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无产者战斗队也有自己的战歌，作者是其主要负责人胡明富（西师附中高六七级二班学生），他在1967年8月4日率队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845厂（炸药雷管厂）时中弹身亡。他创作的《无产者战歌》歌词为：

我属无产，名为钢铁。组织如钢，纪律似铁。一举一动，从不乱越。对己对彼，都要严格。革命途中，不停不歇。革命后代，誓作钢铁！

在这场双方都以“誓死保卫毛主席”为口号的荒谬战争中，仅重庆大学，就死去27个学生（其中八一五派25人，反到底派2人），大约要算全国高校学生死于武斗最多的一个典型。现在已经批准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沙坪公园里那一处安葬八一五派部分武斗死者的“红卫兵墓园”里，就长眠着死于武斗中的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工业学院、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二中、三中、六中、七中、

十二中、十八中、十九中、二十中、二十五中、二十九中、三十二中、三十五中、四十中、四十一中、四十七中、重师附中、红岩一中、红岩三中、三江高中、工业校、钢校、电技校、林校、山洞民中、冶金民中、南岸红星民中等大中学校的学生。^①

在大规模武斗中，教育界多年积累的物质基础也遭到严重毁坏，大量图书、仪器被毁被盗，校舍建筑、教学设施基本上“体无完肤”，重庆大学、重庆交通学院、六中、七中、二十中、电力学校等校舍都遭到了武斗炮火的损毁，重庆河运学校、校实习工厂、库房和东、西学生宿舍及西教学楼等全部建筑更是被武斗人员先后炸毁、烧毁。

在1967、1968年的大动乱中，学校经常处于停课与复课的反复折腾中。1967年春一度“复课闹革命”，但很快就被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冲突打断。1967年9月中央发布“九五命令”，两派群众组织交枪、停火之后，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1月29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重庆警备区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提出复课闹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最高纲领，开展教育革命。12月5日，重庆市革筹组和警备区发出《关于加强对复课闹革命工作领导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复课以后把全校各级各班都办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然而在当时形势下根本无法真正复课。学校两派对立严重，处于弱势的一派师生返校后往往会遭到在学校占优势一派的殴打驱逐，甚至发生严重流血事件。1968年9月12日，重庆工业学校反到底派学生列队返校，竟在校门前遭到占据学校的八一五派机枪搜身，当场打死学生四人。因此这段时间的“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名存实亡，个别学校短时间里的复课，也只是读读《毛主席语录》和报刊社论文章，唱唱“样板戏”之类，基本上不能正常上课。

第五节 “读书无用”大气候下的“教育革命”

1968年秋，随着毛泽东下令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和北京其他高校，群众造

^① 这是依据现存墓碑上还能分辨的文字作出的统计，还有不少墓碑文字已经风化剥蚀。

反运动终于不再得到中央的支持。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随后，重庆市也按中央部署向各大、中、小学派驻了工宣队。

8月27日《重庆日报》报道：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初中、小学于9月1日开学的决定。这时，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在全市展开。10月里，全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布撤销总部，随后各单位群众组织陆续解散，近两年的“无政府”状态终于结束，开始了在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下的“斗批改”。

正当教育界在逐渐安定的形势下考虑怎样“复课”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骤然降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经新华社发布，全国掀起了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热潮。重庆市从1969年2月4日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到1973年7月，重庆全市已有25万多知识青年被安排到涪陵、万县、达县、江津、宜宾、内江、南充等地区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落户^①。自毛泽东指示下达之后，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成为雷打不动的大方向，每年的中学毕业生都只能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只有很少一部分才能从农村被招工调回城里。

1970年7月1日，重庆市教育局制定《关于重庆市1970年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意见》。由于文革开始以来学校停课，造成连续5年的小学毕业生共56万人，均要集中于去年和今年升入中学的严重状况，决定本年中学招生采取紧急措施：在国家办学的同时，大力发展厂矿、企业和农村社队办学；城乡小学均要附设初中班（即后来民间所说的“戴帽”班）；抽调一部分小学教师教初中班；安排一部分复员军人、大专毕业生作教师。由此，许多小学附设初中班，小学老师教初中课程，成为文革中的又一“新生事物”。

1970年9月，停课多年的重庆市高等院校开始招收新生。按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年全市10所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2488人。

^① 《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39页。

由于中学生不能直接升大学，大学到底应该怎样办也面临许多难题。而工人则成为当时最有地位的“领导阶级”。在这样的形势下，许多教师都希望能改行当工人。1969年7月1日，重庆工业学院撤销，改建为国营七一仪表厂。1970年4月10日，重庆邮电学院撤销，改建为电信总局529厂（1973年改建为邮电部第九研究所，1979年恢复办学）。据重庆市1971年统计，当年在渝高等院校在校生仅有1761人，是1949年以来人数最少的一年^①。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成为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所谓“教育革命”实际上成为对教育的摧残。

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气候下，“读书无用”成为普遍的共识，尽管官方媒体不断在批判“读书无用论”，但对于广大青少年学生来说，读书的结果都只有到农村去当知青的命运，读书又有什么用？

广大教育界工作者在这样的形势下唯恐被说成是“黑线回潮”、“翻案复辟”，人人谨小慎微，拼命表现“革命”，于是，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著作，音乐课主要唱“革命样板戏”选段，中学的物理、化学等课程全部取消，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

仅举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1969年7月选编的重庆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一年级用）^②为例，其篇目为：

1. 毛主席诗词

沁园春 长沙

^① 《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32页。

^②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选编，重庆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一年级用），重庆市印制一厂印刷，重庆市新华书店发行，1969年7月。以下引用均出自该教材。

附录：峥嵘岁月稠

2. 尉凤英同志的发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上
3. 红太阳照亮安源山——工农兵诗选（注：选诗《安源颂》、《〈毛主席去安源〉放光芒》、《军舰上升起红太阳》三首，无作者署名）
4. 世界革命人民热爱毛主席
5.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6. 访“红岩”
7.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 将革命进行到底（节选）
9. 打倒李井泉 批臭李井泉（注：节选自1967年6月21日《新重庆报》）
10. 剥削有罪，罪该万死
11. 红马夹
12. 论“打落水狗”（注：节选自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3. 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14. 毛主席诗词二首
 七律 冬云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附：《七律·冬云》注释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注释
15. 谁也救不了谁
16. 孙玉国同志的发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上
17.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节选）（注：节选自姚文元文章）
18. 一月巨变
19. 威镇长江——记参加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英雄们
20. 介绍一个合作社
21. 毛主席诗词
 七律二首 送瘟神
 附：《七律二首·送瘟神》注释
22. 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

23. 青年运动的方向（节选）
24. 农村十年（注：邢燕子文章）
25. 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注：侯隽文章）
26. 彻底地亮 狠狠地斗 坚决地改——李文忠同志生前思想汇报提纲
27.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节选）
28. 《收租院》解说词
29. 谈京剧革命
30. 《沙家浜》（节选）
第二场 转移
31. 应用文几则

在这个“革命化”的教材中，作者署名也是很有讲究的。除毛泽东的诗词、文章节选和江青的《谈京剧革命》有署名外，鲁迅和姚文元的文章节选是在题注中说明，尉凤英、孙玉国的发言在标题中已有作者名字，邢燕子、侯隽的文章则是在文尾说明，其余均无作者署名。此外，除毛泽东诗词、著作及其他少数几篇文章外，大多数文章（包括鲁迅、江青的文章）在前面均加有“毛主席语录”，有的如《〈收租院〉解说词》前还加有“林副主席指示”。

在这个教材最后的编辑《说明》中，编者明确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语文，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属于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语文教学，应该成为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培养学生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掌握好语文这个武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该教材中的“语文知识（一）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中就有这样的“知识”灌输：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工农兵群众写的一首首诗歌，一篇篇致敬电，用最美好的语汇、最完美的形式，表达最美好的愿望，抒发了工农兵对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一字字，一句句都凝结着无产阶级的激情。工农兵的语汇最丰富、最生动、最切实、最有力。过去，那些资产阶级语法“学者”，把语法修辞吹得非常神秘，其实他们“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根本不懂得语言，真正善于运用语言的，真正懂得修辞的，是工农兵群众。下面介绍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例如：

1，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2，舵手来了！救星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源来了！

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是大海航行的舵手，象（像）这种写法，叫比喻。

3，敬爱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您的思想从来没有象（像）今天这样深深扎根，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像）今天这样焕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像）今天这样巩固，工农业生产从来没有象（像）今天这样热气腾腾。

把句式相同或相近的句子连在一起，尽情抒发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象（像）这种写法，叫排比。

4，井冈扬臂举红旗，赣江奔腾来报喜。

工农兵运用革命的想象，给山水以无产阶级感情，象（像）这种写法，叫拟人。

5，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通天下，您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正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掌握。

6，从此，“不周山下红旗乱”，国际壮歌冲九天，中国工人运动沿着您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林彪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写作时选用毛主席的语录和诗词，采说明问题，阐述观点，表示决心，就更有战斗力，更有说服力，象（像）这种写法，叫引用。

这样的“教育革命”，完全破坏了基础知识教育的科学性、准确性，以政治宣传取代了知识启蒙，实际上让学生根本学不到多少有用的文化知识，学到的更多是空洞的革命口号和文革中泛滥成灾的“假、大、空”的恶劣文风。

在举步维艰的“教育革命”中，教育界还不时遭到新的冲击。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中央以[1974]5号文件发出《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将一个初中女学生因考试不好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的不幸事件升级上纲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典型，该校负责人和学生班主任被逮捕判刑，并在全中国展开批判，到处查、揪类似人物。2月18日，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传达中央[1974]5号文件的通知》，要求除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外，应迅速向大、中、小学(含中专校)的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传达。

与此同时，北京一个小学五年级女学生黄帅由家长代笔写的批判老师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文章被中央媒体大肆炒作，树立为“反潮流精神”的样板，号召全国学习，在教育界掀起批判“师道尊严”的高潮。1974年5月18日，重庆市教育局、文化局、市总工会、市贫协筹备组、市妇联、团市委发出的《关于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合通知》中，也不得不号召少年儿童以黄帅为榜样，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争当批林批孔的小闯将，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

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折腾，使得广大教育工作者人人自危，一些原来对“教育革命”还抱有一些善良美好愿望和积极性的教育工作者也感到动辄得咎，不知所措。实际上所谓“教育革命”已经走入绝境。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教育才重新走上正轨。■

【评论】

“红色读物”读解（一）

——革命新人斗志昂：读《新来的小石柱》

潘祛病

如果说《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是党对20世纪中叶中国农民精神形象的期待，那么小石柱就是那时少年儿童的典范形象，——无产阶级“革命新人”。

“革命新人”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语汇，常见于报章杂志。无论是真人实事，还是文学创作，树立“革命新人”典范，成为当时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理想的“革命新人”显然是相对于旧人而言，这里的新旧当指人的思想是否符合党的培养标准。革命新人大多可以理解为那种没有被旧的思想文化熏染过，或者是能够按照党的要求自觉抵制旧的思想文化影响，确保自己头脑中对1949年前中国的认识，与党的宣传语境保持一致，语言、行为符合党的要求和期待。“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少年最符合党的育人方针和计划，最有希望被塑造成党期待的“革命新人”。他们在文革前，被日趋密集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步洗脑；文革中，接受狂风骤雨式的教育革命洗礼。从语言到行动，全方位体现出“思想新、道德新、人格新”。^①虚构人物小石柱就是这种革命新人的代表之一。

1975年出版的少儿读物《新来的小石柱》，在文革尾声那一二年，着实火过一把。该书当时不仅有20万字的长篇小说版，还有上下集的连环画，更有广播电台每日不间断的“长篇小说连播节目”，197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还拍摄过动画片《小石柱》在全国放映。那个年代出书的特点是：品种少，思想内涵趋同，数量大。一本书印个十几甚至几十万册，是常有的事。读者选择阅读的范围受限。思想主题鲜明、内容趋同，强调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充斥文化市场。使党的教育思想起码能在表面形式上显示出进脑入心，教育民众，统一认识的趋向。

小说主角小石柱，是个1970年代初被选拔进省体校，进行专业体操集训的农村少年。这位被体校党支部委员高教练专门从革命老区挑选来的孩子，在技术

^①启之：《毛泽东的“新人”——从雷锋到红卫兵》，载《狂飙错乱的毛时代》，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3年4月，第25页。

至上、“锦标主义”思想强烈的老专家李教练眼里，根本不是块练体操的材料。该书围绕小石柱在省体校的训练生活，讲述了一连串他与落后思想，后进人物，甚至阶级敌人坚持不妥协斗争的故事。“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敢于同错误思想斗，同错误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各种困难斗……”^①，伴随这种斗来斗去的故事情节，完美展现出主人公的斗争精神，一代“革命新人”小石柱，在无穷尽的斗争滋养下茁壮成长起来。

其实，这个时期，培养社会主义“革命新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让年青人具备强烈的斗争精神。学习伟大领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尤其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小说主人公，天天听到、见到，被灌输的都是如何进行与人斗。他的斗争意识被不断加码提高，终于成了有高昂斗志的革命新人。

革命新人首先新在语言上。小石柱与人对话，哪怕就是和顽皮的小伙伴比个儿头，也必须带出些革命化的词句：“……不过光长个不行，思想也得长，要不长成个迷迷糊糊的傻大个儿，那该有多糟糕！”

面对爱看“硬皮大厚本书”，爱吃高级零食，注重竞赛成绩，“有落后思想”的体操队同伴，小石柱大道理的分量重了很多：“要是是一个同学比赛得分高，平时思想孬，也算好把式？”，“……只管翻跟头，不问别的事，长大怎么接好革命班？”，“接班的本事，是为人民服务的本事，干社会主义的本事，咋能光看比赛得分高低？”，“技术好，思想孬，跟头的方向也会歪！”“俺才不要牛奶糖呢，^②反正思想不好的人，方向就要歪，路子就要偏！”

听到高教练讲述文革前出成绩的体校学员如何追逐名利，看不起自己父亲时，小石柱会愤恨地吐出：“哼，思想变得这么臭，这么修！”，“小石柱象闻到什么变馊的食物，皱起眉头往地上啐了一口。”

针对文革中受过批判，至今仍坚持用技术至上教导学员，不肯悔改的李教练，小石柱的原则杠杠硬：“……宣传为革命练武术的道理，怎么是胡闹？”^③（P169）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革命化的词句明显收窄了小石柱的思考

^① 童边，《新来的小石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5月北京第一版，扉页内容说明。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列注释。

^② 故事所谓思想落后，获过体操大奖的同学要给小石柱高级糖果吃。

^③ 针对体操队的小石柱率领武术队同学去公园占领阶级斗争阵地，李教练要求小石柱写检查。小石柱与李教练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

维度，使斗争意识在思想空间中的位置相应扩展。一切问题都采用阶级斗争的逻辑来分析解决。那么，来自山村的小石柱为什么会张嘴闭嘴都是这一套？他的政治性、斗争性从何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前辈的“传帮带”。体校党支部书记高教练的语言套路，给革命新人的思想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我们的少年运动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毛主席告诫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我们担负集训任务的体操教练，……不能只抓技术，不抓思想。”“高教练经常暗暗地想：“……不能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在极权体制下，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民众的意志。统治者需要斗争，整个社会就只好乌烟瘴气地斗成一团。本小说成书于文革后期，这时的中国教育界，正在按照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突出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已经处于基本定型状态。文革前阶级斗争教育，仇恨教育，已经在文革初期结出累累血染的硕果。红卫兵小将不仅在学校内斗老师、打校长，甚至在社会上制造出大面积血腥躁动、惶惶不安的气氛。在停课两年，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学校的教育基本围绕着两个环节进行，一是对领袖和政党的忠诚，二是对五类分子、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仇恨。社会主义的幼苗要用这两种养料培育。小石柱成长的养分也基本来源于此。

高教练的训育当然不是小石柱唯一的政治语汇来源和精神支柱。在小主人公告别山乡来体校前，他那位为革命立过战功的英雄爷爷严肃地叮嘱孙子：“你能到省体校学体操，这真是托了毛主席的福啊！……，要听党的话，……为毛主席争光！为贫下中农争气！……要做社会主义的好苗苗！”。在社会家庭影响与学校教育的互动中，主人公的“革命新人”品质日趋完善。对高教练和爷爷灌输的“正确思想”，小石柱自觉服从、欣然接受。

小石柱的斗争新人形象当然不只停留在口头上，他的行动也在突出着这个风貌。象那个年代的“反潮流”学生一样，小石柱在校园里给思想落后的李教练贴了大字报：“……只管跟头高和低，不问思想好和差。……不看路线只管练，这种教法问题大！人民送俺学体育，不为人民俺为啥？！”继文革初年接受过革命群众批判洗礼的李教练，再次沦为省体校大批判对象。革命小将小石柱要帮他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同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

其实从书中不难看出，小石柱本是个集多种优秀品质于一身的少年。他有爱心，能帮助同学缝补衣服，攒着体校发的苹果，留给远在山区务农的昔日小伙伴；他意志坚强，刻苦训练，在其他小运动员一次只做100个“两头起”的时候，他能咬牙做1000个，感动了体操房里所有的教练和同学。但这些优良品质只是为了衬托他的斗争性。比起这些，他的斗争精神发挥出的效力更大，影响也更深刻。他似乎天生对火眼金睛，能把人的所谓进步、落后，甚至反动、敌对，看得一清二楚。对那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来自小石柱家乡的地主儿子张大夫，小石柱从一开始见面就对他有非常多疑问，保持着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随着故事的发展，他开始盯梢与张大夫来往密切的、平时只注重训练成绩的学员，最终在公园发生了一场与张大夫争夺阶级斗争阵地的正面交锋。

通常一个服从性较强的人，很少会同时具备坚定的斗争性；反之斗争性突出的，也较少会表现出服从性格。但这两种矛盾的个性，却同时存在于小石柱身上。他的个性持守在“……服从与斗争这两种品质”的两端，两种矛盾的性格汇集一身。^①小石柱一方面始终表现为对革命领袖、正确路线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忠顺”；另一方面又对所谓落后观念、错误思想和阶级敌人进行抵制、批判，甚至是展开正面交锋。小石柱被塑造成“忠顺与战斗精神”一体的形象。^②

在当时那种思维体系下，这种忠顺和斗争性并不矛盾。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斗争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忠顺；而忠顺似乎又只能用对敌斗争才能呈现出来。在文革期间，专注文化学习已经被定性为“白专道路”；热衷喜爱的体育项目，也有脱离群众体育路线、甚至“锦标主义”的嫌疑；即便是学雷锋做好事，也一定要认清帮扶对象，要准确地做到只能对“同志象春天般的温暖”。总之，离开阶级斗争，任何正常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事情到了此种境界，革命新人还能做什么呢？

应当说，小石柱的形象，只是那个时期少年文学读物中，优秀少年群像之一。由于党对少年儿童培养模式的单一性，从1960年以降，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甚至是到1980年代初，几近20年，文学作品中少年儿童的形象都是紧紧围绕对敌斗争或对党忠诚，甚至为党献身这样的元素刻画。《刘文学》、《向阳院的故

^① 启之，《毛泽东的“新人”——从雷锋到红卫兵》，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3年4月BOD一版，《狂飙错乱的毛时代》，第33页。

^② 启之，《毛泽东的“新人”——从雷锋到红卫兵》，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3年4月BOD一版，《狂飙错乱的毛时代》，第25页。

事》、《收租院》、《高玉宝》，《闪闪的红星》，以及各种诉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在新中国保持革命警惕性，与阶级敌人做英勇斗争，甚至流血牺牲。这样的少儿故事，不胜枚举。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至今还对这些作品记忆犹新。革命新人就是要在成长中凸显这种“忠顺与战斗精神”。

培养革命新人，把服从性和斗争性在一个人思想上完美地结合，这种实验的成功率究竟有多高？人的爱恨情仇，这些复杂而丰富的感觉都按照一种绝对的尺度来衡量，究竟会达到什么效果？把人的思想成长统一成一个模式，并以此为赌注设计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结果又会如何？现在人们对这些现象终于有了些许思考，但答案好像又不是那么明确。

道司·赫胥黎在他的乌托邦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一书中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个新世界里，已经可以按照统治者的需要，预设一种生命体的思维方法、行为模式，包括今后的职业。这种被称之为“人”（如果这种从试管中按需批量生产出的生命也可以称为人的话）的生物体已经不再是爹娘生、父母养，与其他任何人没有亲缘血脉关系，他们只忠诚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福帝”。这差不多有点儿像“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歌曲的意境了。^①赫胥黎笔下，“人”的胚芽按照程序，在工厂的机械试管中成长，在机械摇篮中昏睡数年，被灌输对“福帝”的忠诚意识，昏然快乐地生长。

这种社会理想如果真能落到实处，那么培养小石柱型的革命新人运动恐怕也该寿终正寝了。因为从试管里诞生的新人，天生就会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在社会上工作生活，表达对统治者的忠诚，这会多么节省培养“革命新人”的社会教育成本！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也可能会减少统治者通过“与人斗”获得的“其乐无穷”的快感。对好斗的统治者来讲，这又该是多么乏味的事情？除非，——如果统治者一定要进行“与人斗”的游戏，按照赫胥黎的思路延展下去，还可以在试管中制造出“阶级敌人”，如此一来，阶级斗争游戏就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同时革命新人也就有理由永远存在下去。那种境界，或许能接近伟大领袖所说的“其乐无穷”了。■

2015年3月4日完稿于北京

^① 文革前的少儿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感情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述 往】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上）

李南央

引言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中等学校执行的教育方针可以用它的一句口号来概括：“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口号是适用于一切中学生的，无论其出身如何。一九六三年，那是我中学生活的第一年，我不记得有哪一位学校领导或教师，强调过学生的家庭出身。至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情况才开始变化了。

我选择了“worker”作为劳动者的英文译文。实际上，“worker”是不足以精确、完整地表达“劳动者”这一中文原辞的全部含义的。如果从字面直译的话，劳动者的意思是：从事工作的人（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英文单词，能够区别出“工作”和“劳动”在中国共产党辞典里那种本质性的不同。其实“劳动者”是一个非常含混的字眼。什么样的工作，党才视其为“劳动”呢，这似乎是正确理解党的这一口号的关键。记得我们班曾开过一个主题班会：“劳动者的定义是什么”。同学们无法对这一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都一致同意：家庭妇女，个体经营者和在私有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不能算是劳动者。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简单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论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青的学生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清楚的：只有那些直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才能被称为“劳动者。”可是，什么样的工作属于社会主义建设，什么又不属于社会主义建设，却无人能做出权威性的回答。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六十年代初期，小学生升入中学之前是要进行升学考试的。这一考试在北京是同日、同题目进行的。所有参加出题的教师集中居住，考试开卷前严禁与外界接触，以防“漏题”。考试前一个月，毕业班的学生要添写“升学志愿表”，在该表中要添写三个志愿学校，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志愿，每个学生还要在第四栏中写明：服从分配。就是说，如果你的考分哪个志愿学校也够不上的话，你必须接受市教育局对你的分配。一般来说，这种分配学校的教学质量都不怎么样。添志愿是一门学问，老师通常会根据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提出建议，应该把哪些学校添入第一、二、三志愿。但是有些学生也会冒险报自己水平难及的学校，万一考好了呢？这一程序，似乎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学校录取学生唯一的标准就是分数，硬碰硬，谁也别作非分之想。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是否被某个好学校录取，有时只在0.25分之差（百分制）。那时公开的说法是，高干子弟不能走“后门”。这多一半是可信的，我妈妈就曾碰过钉子。我在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但是粗心大意似乎是克服不了的毛病，这对考试无疑是致命的。我妈去见了当时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她们在延安时是老战友。我妈妈把我的平常成绩单及几篇被学校选为“范文”的作文拿给她看，以期证明我是个好学生，万一考试失手，盼有所照顾。我妈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校长的断然拒绝。回家后，她提起此事，也觉自己理屈，嘱我凭本事吧。我却偏不争气，语文虽得了100分，数学只拿了个90分，把我直抛到了第三志愿：第十女子中学。女十中在北京几所女校中排行第七，我简直丧气至极。那时的女十中名声很糟，人称“流氓”学校。原因是其校址在新街口大街上，每到放学时间，总有许多男孩子等在校门口。不过我运气还算不错，就在我入学的前一年，女十中取得了极高的大学升学率，作为奖励，北京市教育局为学校盖了一所新教学大楼。学校因此迁到位于一个僻静胡同的新址内，我正好赶上了新校址，并且也赶上新的新生录取分数线，学生的质量大大提高，“流氓”学校的名声算是摆脱了，不再有男生在校门口等女生的事发生。那个时候，要是哪个女生敢在中学时交男朋友，在学校里是难以容身的。

就在我入学后不久，我发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完全的真实。开学一星期后，两名同学从分配学校转到了我们班上。班上的同学们很快就知道了她们的身世——将军的女儿。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班上没有人看得起她们。六十年

代初，走“后门”是很耻辱的事情。其中一位同学渐渐地被班级所接纳，因为她学习成绩其实不错，后来还被选为语文课代表。另一位就差多了，似乎从未有人真正与她成为朋友。进入初中二年级后，班上一位元帅的女儿离开了我们，转入师大女附中。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学生，二十年后，我读到了一篇写她父亲的文章，知道她成了一名军医，很受同事们的尊敬。但是在她转学的时候，整个儿班级确实为这种特权震惊了。师大女附中是女子中学中排行第一的，它的校长也曾大义凛然地拒绝过我妈妈的错误要求，可现在是怎么的了？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对军队干部的女儿们是不适用的。我有些被欺骗的感觉，我得承认，葡萄对我是酸的。

对干部子女的特殊待遇

在我进入女十中时，初中一年级共有八个班，每班大约有四十至五十名学生。校领导把入学新生中的所有干部子弟集中到了初一（二）班，我也在其列。但是干部子女的人数其实并不足以凑成一个完整的班级，因此班上还有不少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不过同学和老师还是把我们班叫做干部子弟集中班。在初一年级八个班级中，只有两个班学英语，其他六个班的外语课都是学俄语。那时由于中苏两国关系已恶化，同学们对俄语都没有什么兴趣，认为英语比俄语好。而我在的班是学英语的。每个班级都设有班主任，管理学生的品行思想及与家长的联系，校领导指定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做我们班的班主任。这两项是我所能记忆起的对干部子弟班的特殊待遇。总地说来，班内同学交朋友都是以性格、爱好为主，没有什么人以家庭出身标准的，我们班与其他班的关系也不错。不过校领导给予我们班的并不太多的特殊关照，在其他班级还是激起了愤慨和嫉妒，这一点，我们班的同学开始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次在校春季运动会上，我们输掉了拔河比赛，其他班级的反应令我们瞠目结舌，诧异万分。那些同学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初一（二）班输了！”“真是太活该了！”“她们一天到晚吃大米白面，让我们吃粗粮的打败了！”“太解气了！”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不禁怒不可遏，觉得这么说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班那时确实事事争先，不论是歌咏比赛还是舞蹈比赛，不论是篮球联赛还是军体竞技，总是名列前茅。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跟吃的什么饭根本就没有关系！不过这件事说明了那时学校的气

氛，学生们可以自由、充分地表达对特权的不满，干部子女们则没有一个人敢以家庭出身炫耀于人。我记得那时我最怕有人知道我妈妈是高干，而对我另眼相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完全翻了个个儿。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平常十分腼腆内向的女孩子，在八月红卫兵的集会上大喊大叫：“有那么些人恨我们‘走后门’，恨我们‘自来红’，今天我们要正告你们：我们就是‘自来红’，我们就是有特权‘走后门’！你们他妈的狗崽子就是‘自来白’、‘自来黄’、‘自来黑’！……”她的嘴就像一挺机关枪，吐、吐地不停连射，大有要把一切胆敢反对她观点的人就地枪决的架势。我震惊无比，不知她是如何发了疯，把我们过去如此不耻的事情，这样堂而皇之地宣布成革命的真理的。难道她的姑父吴德成了北京市新市委的副市长，就令她如此昏了头，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心里也觉得有几分滑稽，那时北京有一种很大众化的点心名叫“自来红”，圆圆的，红糖夹核桃芯，皮上有个红圆圈。比什么不好，干嘛把自己比成点心？当然只是在心里偷偷发笑，脸上是不敢作出来的。环视周围的同学，不是一脸的惊愕，一脸的恐惧，就是一脸赤红的昂扬，似乎没人觉得这种比喻有什么不妥。

试图限制特权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城市居民开始使用粮票，每月的订量中，只有很少的一点儿大米，白面约占50%，其余为粗粮。只有在国庆、春节这样较大的节日来临时，才会以家庭为单位分到一些好大米，富强粉。不过，似乎也只有北京的居民有这个福份。供应的数量是很少的，一般只够几口之家吃上一至二顿。如果再加上蔬菜，水果，肉蛋的严重供应不足，那些一般家庭的孩子对能吃上足够的大米、白面的干部子女的嫉妒甚至憎恶便是很可以理解的了。但是对于非军人的干部子弟们，其实这种愤怒并不公平。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的粮食是完全按订量供应的，从不因父母的地位而得到过什么特供的大米、白面。我哥哥在“困难时期”，两次因饥饿晕倒在学校，被送到校医室，一杯白糖水就是最好的药。在那些年里，我们家得到的仅有的特殊供应是：每月两斤黄豆，两包香烟。因为我妈妈是十一级干部，算高干。当然，当人民在挨饿的时候，对任何一点食品上小小特供的仇恨都是应有的权力。对于军队的高干子弟，大米、白面的生活却是事实。

上中学后，学校一般都离学生家较远，大多数同学都中午带饭到学校。我的

书本总是因此而沾满了菜汁，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塑料袋。学校的锅炉房里有一个大蒸箱，每天早晨，各班的生活委员用一个大线网兜把同学们的饭收集到一起，送入蒸箱。锅炉房的工友到时会打开蒸屉，替我们把饭热好。那三位元帅和将军的女儿所带中饭的质地总是十分的好。我还记得她们带的小巧的富强粉花卷，跟饭馆里卖的一样。菜的花样也多，是那种专门厨师炒的很讲究的菜。我从来没有见她们吃过窝窝头之类的粗粮，她们显然是不受粮食配给的限制。另一件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在打开饭盒之前，她们从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她们边打饭盒边搓着手说：“今天吃什么呀？”接着扑鼻的香气弥散在整个教室。这种时候，我总是拼命控制住自己，死死盯着自己的饭盒。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替她们害羞的感觉。为她们那特殊的食品感到不好意思，为她们毫不为这种特殊感到尴尬而不好意思。当然，如果我自己禁不住香气的诱惑而转过头去看她们的饭盒，我更会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军队派给她们父亲的专职厨师为她们准备好了一切，甚至替她们装好饭盒，放进书包，她们当然不知道每天都带了些什么了。有一个关于那位元帅女儿的真实笑话。有一天，我们的班主任病了，好多同学去她家看她，这位老师出身于工人家庭，家境不很富裕。元帅的女儿在厨房里看到挂面，惊奇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呀！样子怎么这么怪？”后来又看见了煤球，又叫了起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黑呀？”女孩儿们这一下可忍不住了，捧腹大笑，有的笑出了眼泪，她们简直无法相信这位学习很好的同学怎么会如此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无知的令人难以置信。后来班主任找她谈了话，推心置腹地教导她：如果她想成长为一名党所需要的，她父亲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她就应该学会用自己的双手生活，否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每一个青年，不管其家庭出身如何，都应该按照党的教导进行自我改造。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通过这种自我改造会成长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反之，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如果不重视自我改革，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接班人，变质、变色，没有人是锁在保险箱里的，没有人是生来就红的。老师对她所说的这番话，六十年代初在中学里是自然而公认的真理，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乾坤彻底颠倒了，特权这一恶魔自此跳出了瓶子，至今也无人能把它再装回去。

我们能觉出来，元帅的女儿是认真听进了班主任的话，因为很快，她父亲的秘书就拜访了校领导，校领导在这之后做了特殊安排：允许她中午在学校食堂就

餐。说这是一项特殊安排，是因为一般中学的食堂只为教师服务，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办学生大食堂，每班只有一、两个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可在学校食堂入伙。这位元帅的女儿在学校食堂的经历可谓运气不佳，学校食堂一个月打一次“牙祭”，一般都在月末，用当月伙食的结余买些好菜。恰恰在她入伙的头一天，食堂刚刚开过一顿大米饭加烧肉。她入了一个月的伙，大约实在忍受不了清汤寡油，玉米面窝头的伙食，到月末便退了伙。但恰恰就在退伙的第二天，食堂又改善了一次伙食。这一下，同学们又有了另一个关于她的笑话，大家着实为此嘲笑她几天。其实我们如此珍视的好饭，只不过是她的家常便饭。不过同学们并不愿细想这一事实，只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造出的对她娇嫩肠胃惩罚的快乐中。这确实颇有些小市民心理，很多干部子弟十分鄙夷此种心态，这大概也是不同家庭的孩子们很难彻底沟通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阶层，造就了不同的个性和兴趣。其实除了生活能力太差以外，公允地说，这位元帅的女儿是一位好学生，她被同学们选为班委会的学习委员。她性格温文、随和，与同学们相处很好，从不有意识地炫耀自己父亲的地位。多年之后，我在工作的工厂里遇到了她在师大女附中的同班同学，她们说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像其他高干子弟那么疯狂地崇尚出身的高贵，也没有太多地介入运动，很有些逍遥派的味道。她后来很快就参了军，没有像我们一样插队、上兵团或进三线工厂。当我后来读到报上关于她父亲的文章，说元帅对于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子女享受由他带来的任何特权，他的女儿后来成了一名军医，在她所在单位工作了很久以后，同事们才知道她是元帅的女儿。我相信文章讲的是真的，我也相信她是应列为劳动者的行列。她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有幸在一所普通中学就读，而没有进军队子女的特殊学校，如“八·一学校”之类，这些无疑是她能有一条正确人生道路的外在条件。

①

利用特权

与元帅的女儿相反，两位将军的女儿对特权的态度是利用。她们总要时时表现出与我们有所不同，因此在班里大不如元帅的女儿受欢迎。我们觉得她们少将父亲的地位远不如元帅高，可她们总是用高高在上的眼光环视我们这些芸芸众

① 后来有很多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问我这位元帅是谁，我想还是应该告诉读者，他就是：徐向前。

生。她们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中一人是“3分”生。那时在学校，分数是评价好学生的重要标准。一个头脑不聪明，却要摆出一副挺瞧不起人的架子的学生，是很难得到同学们认可的。

到了初中二年级，班里开始建立共青团组织，我们班后来发展到十几名团员，占全班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些。两位将军的女儿没有一个能成为团员。一天，一位将军的秘书到学校见了我们的班主任，这已经不是我们初一时的那位工人女儿了，是学校新任的、特别能说的大队辅导员。秘书访问后的第二天，班主任就召集了班团支部会议，让我们讨论那位将军女儿（以下权且叫做“A”，另一位叫做“B”）的入团问题，理由是A的父亲——将军同志认为他的女儿是革命的后代，应该成为共青团员，团支部应无条件地接纳她。这一下可犯了众怒，大家被这种赤裸裸的特权思想所激愤了。本来我们就对A没有好感，这么一来，老师的努力适得其反，大家一致认为绝不能屈服于权贵，要捍卫共青团的纯洁性，有这种肮脏思想的人是不够标准加入共青团的。如果A真地想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她最好首先改一下自己的行为，学会尊重同学，提高学习成绩，特别是要端正对劳动的态度。我们真是想不出来，她怎么敢搬出自己的父亲来压团支部。在这之后，班主任在团支部会上又多次提出A的入团问题，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但一直未获成功。要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是干部子弟，这种名目张胆地用父亲的官位压人，只能使我们觉得她思想的丑恶。我们才不会只因为谁父亲的官比我们父母的官大就怕谁。A由此而对反对她入团的人结了仇，我却一点儿也未觉察，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才领悟到这种恨有多深，她狠狠地实施了她的报复。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甚嚣尘上时，班里组织了一次专对我的斗争班会。在会上她尖声冲着我叫：“说！你为什么反对我入团？！你爸爸是反党分子，所以你对我有仇，因为我是革命子女。”她边说，边哭，泣不成声，显示了她——一个革命军人的女儿，是多么深深地被我这个“狗崽子”所伤害了。我不知何以对答，一来我是没有权力为自己辩护的，二来我也确实不知怎么跟这种与我持完全不同道德观念的人理对。我只简单但充满倔强地说：“我觉得你不够团员标准。”后来我们上山下厂时，她参了军。我们班上另一名团员，上校的女儿与她同分在一个野战医院，都做卫生员的工作。多年后我听说，A对这位上校的女儿欺辱之极。在医院里没有人直称A的名字，总是冠以

×××的女儿。她未经入团便直接入了党，并很快不再干卫生员进了军医大学，毕业后成了五官科大夫。我觉得她终于找到了可以心情舒畅，快快活活地享受特权的地方了。但是这恰是她自己的悲哀和这个社会的悲哀，良心和公正已荡然无存。她之所以会成为这种偏执的特权狂，我觉得她妈妈有一些责任。文革初期，我们班有位同学偶然路过A的家门，看到了她爸爸的警卫员给她妈妈贴的大字报，大字报说：将军的老婆出身资本家，在嫁给将军前不过是个大学生。资产阶级小姐习气不改，强迫警卫员做家务事不说，月经带也让警卫员给洗。警卫员气愤地写道：“我们拿军队的津贴是为将军服务的，不是侍候他老婆的”。大字报的内容是否属实，无法考证。但是A在学校的表现，使我们都相信大字报的内容确有出处，说不定当初根本就是将军的老婆派遣秘书，假冒将军名义提出A的入团问题，将军本人完全不知晓这些动作，他没时间过问子女的教育。

另一位将军的女儿B，文革中的命运却不大顺利。她开始也参了军，但因为妈妈是地方干部，不久也挨了单位的批斗，她在军队没能青云直上。她后来跟一个普通人家的儿子结了婚，受到家里的反对，不允许再进自己的家门，这使她真正成了老百姓家的儿媳妇。我们班有个同学多年后偶然在街上碰见了她。B谈及自己的生活唏嘘慨叹，说婚后懂得了很多过去不曾知晓的事理，后悔自己当年在学校的很多行为。干部子女不仅受家庭影响，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未完待续）■

1993年5月

【怀人】

我们的妈妈

高嘉陵 高忆陵

家庭

妈妈——庞曾漱，1918年11月（阴历十月初三）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她出生和居住过的老宅子，现在被划在苏州市中心的古城保护区内，原为海宁陈世倌的旧宅。宅子的门前和门后各有一条河。据说，在她小时候，这河里是有鱼虾的。妈妈说她特别爱坐在后门外的石阶上，看着流水和河对面的人家。妈妈一生中，从来不提她家庭昔日的荣华富贵。她有自己的价值观，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一直走到底。这条心路历程起源于这小桥流水的优雅环境，根植于她的善良天性和对真理的追寻，也得益于父母的影响和学校的启蒙。

回忆我们的妈妈不能不从她的父母说起。

说起我们的外公庞京周，应当感谢我们的大舅和上海的小阿姨，他俩为外公撰写了一本小小的传记，从那里我们知道外公一辈子能做官而未做官，能发财而未发财，一辈子奔波不休，好做事也做成了事，乃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是德国留学的医学博士，既是上海名医，又终身热心医学教育。抗战期间，他临危受命，代表红十字会亲自驾车穿越战区，运送医疗器械和食品，曾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他有突出的应急组织才能，“八·一三”后，曾在几天之内，组织起有三千床位的伤兵医院，规模之大与组成之速，世所罕见。他说：“人命有长短，我唯期能日做倍人之事，则虽寿五十，等活百岁也。”这种被称为“生命浓缩论”的自处之道，对妈妈有着极深的影响。

忆陵：我外公热情，健谈，好交友，好做事，也好“得意”。这是我们家传的一种得意，就是做成功了什么事，喜欢说出来，既非炫耀，也非忘形，只是一种真实的高兴情绪的流露。外公的形象很特别。在我的眼里，五十年代他走在北京的破旧的胡同里，与解放后的社会环境很不协调。他穿一身白西装，而且是背带在外面提着裤子的那种，系着领带，胸前吊着怀表的链子，嘴里叼着古巴雪

茄，手提一根手杖，一米八几的个子，又高又瘦，一副绅士派头。六十年代，外公拖着多病之躯来京住在我家。据我小阿姨说，外公心里是很爱我妈妈这个大女儿的，因此回上海后还说在北京和我们同住的日子是多么令他愉快。外公极爱聚友聊天。章士钊、顾颉刚、叶圣陶等幼年的同学、挚友到我家来，这一群老人围炉而坐，吃着外公亲自烤制的点心，兴高采烈聊天的样子给我记忆犹深。外公教我给他打针。我从来没想过我能给别人打针，心里有点怕。外公用简洁清楚的语言告诉我要做些什么，怎么做，注意什么。我照他说的，第一针扎下去，针头弯了。第二针扎下去，按照要领回抽时，又抽出好多血，他叫我拔出来，换个地方再扎下去。这一次教我打针，他虽然连挨三针但高兴得要命，连声地说：“好，好，各种情况都让你碰上了，这就全记住了，这样学习最好。”这件事给我留下“外公是个非常好的老师”的印象。我认真地说，我妈妈的性格有很大部分是从我外公那里遗传来的，就是说，妈妈“颇具乃父之风”。

妈妈曾说她的母亲是一个“刚强、沉着”的人。妈妈念中学时，蒋介石的毛夫人到苏州“选美”，在打听妈妈的情况时，外婆断然回绝说：“我是要让我女儿念大学的。”外婆活到九十六岁，无疾而终，头脑始终清楚，时有惊人之语。“文革”中红卫兵给她剃了阴阳头，打倒在地，她说当时她想：“我得活着，我倒要看看这一切到时候怎么收场。”在她八十多岁时我们问她：“你现在活着是为什么呢？”她马上回答：“我要看看世界的变化。”她在遇到病痛，处于弱势时，常用自我解嘲来对付，爱开玩笑。她的生命力很强，在九十四岁高龄时，还在床上做诗，内容是回忆童年、想念母亲（她是独生女，其母守寡很早）。外婆是高中毕业，她说过，如果没有五个孩子的拖累，她出国留学，也会和吴健雄一样。妈妈从外婆那里受到了不少好的教育。妈妈在跟小外孙子高猛聊天时说：“苏州振华女中的王季玉校长是个留美归国为事业献身的女性，一生未婚，妈妈在学校里和大家一样崇敬这位校长。”外婆曾对妈妈说：“如果你能做个王校长那样的人，我就满意了。”妈妈说，这话她记了一辈子。因此她从小就树立了王校长这样的人生楷模，而且一心要实现自己母亲的期望：作为女性，要独立，要自强。这件事说明外婆在某些方面对妈妈的影响是深远的。

妈妈兄弟姐妹五人，关系友善，据说这也是家传。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的二舅、二姨热情邀请妈妈和大舅到美国去观光。特别是大舅，是坐着轮椅

去的，一下飞机，二舅就来推着哥哥出机场，这一幕是很感人的。国外的弟、妹们都为哥哥、姐姐上了医疗保险，自始至终关心备至。二姨对妈妈感情尤深，妈妈去世后她说：“我从小就佩服她，到今天我更佩服她。她一辈子好强，这一次她以能战胜病魔为快，最后的表现也很出色……你们看她四月一日来信，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还寄来‘美通宁’和其它冲剂的说明给我们，她总是想到别人之后才想到自己，所以大家都爱她。”

我们的小阿姨说，妈妈对人充满同情心，对小阿姨的亲生母亲（即我外公的第二任夫人）很好。那是个旧社会的不幸女人，妈妈毫不歧视她。40年代在重庆还跟她谈心，鼓励她作为女人不要全依赖男人，要自立自强。小阿姨说，她的母亲一直很感谢妈妈。后来她积极参加街道工作，积极学习，也不无妈妈的影响。

振 华

妈妈从小学就开始住校独立生活，这使她摆脱了封建大家庭的影响，获得了几方面的优点和优势：一是形成了靠自己奋斗的坚强个性，在女性中这点尤为可贵；二是形成了关心人民疾苦的博爱精神和爱国思想；三是形成了高尚的精神境界，鄙薄物质享受，追求真理和正义；四是在集体生活中，形成了办事效率高，计划性强，待人友善，善于协调配合的能力。

她在病重期间，常常回忆自己小学、中学的生活，全部都是愉快的记忆。她说：“我这人一辈子到处受宠，在哪个地方大家都喜欢我，对我都很好，简直是得天独厚。”她小学时，杨绛、何泽慧、王回珠等高年级的大姐姐都很疼爱她。妈妈在学校里像个男孩子，胆子特别大。她曾和同学一起捉蛇，煮熟后剔除肉，把蛇骨洗干净，重新拼成一条蛇的骨骼标本，据说这作品还得了奖。她十分活跃，组织唱歌、跳舞、演戏都少不了她，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她什么都敢做也总能想办法做。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时，没有服装，她就买了一大块布，几下子就做成大斗篷，使演员们穿上后立即变得栩栩如生了。在演戏中她常常演男孩子；有了自行车，也是她和几个泼辣的女孩子先学会骑……妈妈虽然生在仆人成群的高门大院，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庞家的大小姐，可她身上没有一点儿骄横造作的影子，相反倒是恭谨让人和节俭朴素，这和她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妈妈极重同学情谊，与振华女中的老同学一直保持往来。她曾带我们去看望何泽慧、王回珠这几位八十多岁的老大姐。一直惦记苏州陈定瑞阿姨喜欢喝茶，一有好茶叶她就为陈阿姨留着，最后一包茶叶是妈妈去世后到苏州安葬时由忆陵交给陈阿姨的……叶吉益阿姨是中学里跟妈妈最为亲密、情同手足的好友。妈妈病重时对叶阿姨的回忆也最多。生病后期她没有力气看信，不让我们白天给她念叶阿姨的来信，要留到晚上再念，说：“不然一天都要难过了。”这是妈妈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中极少流露的情感上的悲伤，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她说当年她和叶阿姨老到图书馆去温书，她俩穿一样的衣服，拿一样的手绢，她俩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手绢包书的方法……

忆陵：我送妈妈的骨灰回苏州时，到振华女中，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我觉得这里充满了一股灵秀之气。旧时的“长达图书馆”仍静静地立在那里，正对着像龙一样腾跃欲出的江南第二太湖石——瑞云峰。奇石、小径、栏杆，静谧、优美、深邃。两位女校长——王谢长达和王季玉——两代传奇式的女教育家的纪念碑和胸像体现着振华的精神。走在这里，我的眼里老闪现出两个秀丽、朴素的少女身影，与周围的景色融合在一起，无法分离。“莫辜负冰雪聪明！”这是妈妈从振华毕业时严师的告诫，这冰雪聪明在振华这块土地上得到孕育。我的母亲没有辜负母校给予她的滋养，以冰雪般纯洁的心灵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从这点来说，苏州确实是妈妈的灵魂的最恰当的安息之地。

浙 大

妈妈高中毕业正值“八·一三”事变，她的同学留言簿上画着一幅东三省地图，旁边写着：“当你对着她，觉得有何责任，在你的身上？”这正是她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的写照。她随家庭去牯岭、汉口、长沙、香港等地避难后，1938年7月去江西泰和，到浙大报到。

在浙大，妈妈确定了一生的道路。她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和不愿作亡国奴的爱国思想使她在进步同学和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她积极参加“黑白”文艺社和马列主义小组的活动，为了工作的需要而从物理系转到外文系，她从参加进步活动的一开始就充满了牺牲精神与实干精神。一

位浙大的阿姨曾告诉我们，在广西办“妇女识字班”时，女同学们住在乡下没有厕所，她看见妈妈一个人为同学们挖厕所。当时她就很受触动，觉得妈妈不是原来印象中的大小姐，认为妈妈这个人是能干大事的。浙大给予妈妈人生的启蒙，确立她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她与我们的父亲高昌瑞的感情也是建筑在这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上的。

父亲1935年考入上海交大，曾参加进步学运，当过学生会主席。后于1937年考取浙大，与我大舅庞曾淮相熟，1938年在泰和初次认识我妈妈。后来在浙大组织“拓荒社”（后发展为马列主义小组），他们共同参加了许多进步活动。当时，爸爸是以一个激昂慷慨，热情洋溢的革命者和老大哥的形象出现的。爸爸1939年毕业到重庆工作，妈妈曾去看他，看到他睡在没有床单的棉絮上，上面尽是沙土，盖的也只是一张棉絮时，只想到这是一个革命者献身事业的表现，而没想过与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将有怎样的不可承受之重。妈妈曾把爸爸看得很高，不无崇拜之意。而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一方面热情豪爽、富有正义感、思维活跃、敢说敢做；另一方面不修边幅、自由散漫、长于空想、不切实际，常常陷于自我矛盾之中。爸爸在环境困难、创业维艰的时候，常有上乘的表现。但解放后他因讲真话、不会协调关系而官运不济，从1957年开始又往往是每场运动中的“运动员”。社会上受的挫折会映射到家庭里来。他们思想方法上的差距加上对当时许多问题的实质无法看清，使得他们难以相处，但他们作为朋友和同学的关系却一直延续着。爸爸每次当“运动员”，妈妈都帮他写检查，“文革”中仍是如此。妈妈从不“落井下石”，在爸爸倒霉时从不提离婚的事，还常常从生活上关心爸爸。我们长大成人之前，妈妈为了我们姐妹俩一直没有离婚。这使我们姐妹俩从小有个概念上完整的家，心理上毫无创伤，为此我们内心深处对妈妈是非常感激的。我们懂事后，才知道他们失去了多少人生本该享有的幸福，妈妈为我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爸爸的日子又过得多么不像样。这一切，除了他们的性格使然，也不能不说是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许多人为妈妈这段不成功的婚姻惋惜，其实，对妈妈来说，这仍是无悔的人生：爱过、生活过，而且很美好。妈妈在重病期间说：“其实还是和高昌瑞在一起最有意思（当然，一起生活是另一回事）。”这与当年他们一起追求真理，一起经历革命风暴的洗礼是分不开的，对妈妈来说，一生中最有意思、最难忘的确实是在浙大和育才度过的那些岁月。

育才

妈妈从浙大毕业后，于1942年11月到重庆育才学校教书。把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称作一个熔炉是最恰当的。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不论是教师、作家还是音乐家、画家，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用哪句话概括都不如用陶老夫子自己的话概括得准确：“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他们身上，求真的愿望是那样执着，真人的品格是那样闪光，他们每个人都仿佛有着特别强的生命力。

妈妈出身大家闺秀，在重庆又出入于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庭，深得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洪兰友的喜爱。1942年10月3日爸爸妈妈结婚时按地下党的意见，为开展工作的需要，办了一个很风光的婚礼。许世英（当时的赈济委员会主席）当主婚人，洪兰友代表女方家长（当时外公在外未能赶回）。结婚后，妈妈完全有条件得到一个收入优厚的舒服的工作，地下党负责人也有意让她隐藏在上层做秘密工作。而妈妈当时对爸爸说，她想做“实实在在心上的工作”。于是她选择了到育才去教书。

妈妈当时住在山上一间破房子里，生了嘉陵后生活很是艰苦。国难当头，配给不足，米里尽是砂子和虫子。妈妈从来不要外公接济，和育才的师生一样，每日三餐稀饭加一些豆子当菜。嘉陵因此一直多病、营养不足。我们的小阿姨回忆说，外公有一次到山上找妈妈，妈妈去上课了，他看见屋里只有嘉陵包着小被在床上哭着，身上尿湿了，而且还发着烧。外公心疼而又感慨，说没想到曾漱能过这样的苦日子。他喜欢他的大女儿，对于妈妈能够完全自立、不靠家庭，在抗战期间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生活、投身教育，是十分赞赏的。在一张小照片后，外公特地题上“漱屋前抱其儿，屋为土墙而茅顶见另一片”几个字。从照片上确实能看出当时条件之简陋。

在育才，妈妈的精神世界却是无比富有的。陶行知先生创立的一整套生活教育理论，对育才师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妈妈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四乡农村工作，四川农民的困苦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她为贫苦大众服务献身的志向。育才的师生关系亲如兄弟姐妹，校园生活有声有色，朝气蓬勃。记得妈妈爸爸都提到过，他们自然组上演了一个“化学之舞”，一个学生代表一个元素，在舞蹈中传授了

知识，很受欢迎。学校当时集结了文化界大批名流和进步力量，地下党的力量很强，教师素质较高，民主气氛很浓。育才的师生们都终生难忘这段生活。

忆陵：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育才的师生到我家来聚会。妈妈把几张桌子拼起来，罩上一块大白床单当桌布，上面摆满菜肴。大家特别庆贺原育才学生杨秉荪（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每个人脸上都是满面春风，兴奋异常，大家一遍又一遍地举杯庆祝“四人帮”的倒台。谈起育才，谈起陶行知先生，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杨秉荪悠扬的提琴声使大家听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陶醉，要知道，那是在“文革八年八个样板戏”之后啊。不知谁起了个头儿，大家一块儿拍着手唱起了陶行知先生作词、贺绿汀先生作曲的育才校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我很少听妈妈唱歌，看到她笑着，拍着手，摇着头，和一屋子人放声高唱，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陶老夫子的教导在妈妈心里深深扎了根，成了她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妈妈在病重到半昏迷之际，还喃喃地说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多好啊……捧着一颗心来，来哪儿啊……来到受苦的人中间……”如果要问妈妈为什么一辈子初衷不改，一辈子身上有用不完的力量，一辈子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根源就在这里：育才学校蕴育了她伟大的人格。

妇 联

抗战胜利后，根据南方局“隐蔽精干，保存力量”的指示，妈妈和爸爸一起回到苏南，在苏州振华女中、无锡辅仁中学及竞智女中教书。解放后，在辅仁中学，她担任了党支部书记，被选为无锡市人民代表，从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她在无锡市妇联任秘书长工作，同时是中共无锡市委宗教委员会委员、协商委员会委员，继任人民代表。当她于1951年春天调往北京全国妇联时，已是一名成熟的、有一颗赤诚之心的党的干部。在妇联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里她一直辛辛苦苦地做着秘书工作，高效、出活儿、计划性强、能干……是有口皆碑的，但许多人都觉得她在妇联没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非常可惜。

嘉陵：自从1951年北上到全国妇联工作一直到“文革”，妈妈与亲属、过去的同学、朋友来往极少。大家都关心妈妈这一段生活、工作的情况。离开妇联后，妈妈基本不谈那段生活，我仅从孩子的眼睛看到的事情以及“文革”中妈妈向我们谈的情况，讲一概况，以慰亲人好友们的关怀。

1950年后，南方大批干部北上，妈妈是由电力部门调动北上作教育口的工作，因我爸爸当时在东北列车发电厂。当时帅孟奇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又是全国妇联的组织部长，当她看到妈妈的档案后，说这个干部我们要了。于是我们离开了组织部招待所住进了椿树胡同2号妇联大院。当时的妇联很有根据地解放区的气氛，妈妈又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革命大家庭中。那时的干部大多数是解放区来的，总共只有几十个人，邓颖超、康克清也常来常往。妈妈常跟我讲，那个阿姨是延安来的；那个阿姨是太行山的八路军，是妇救会主任，像刘胡兰一样；又有一个阿姨是宋美龄的秘书，救了我们好多同志……她从心里佩服她们，向她们学习马列主义、革命作风。刚到组织部不久，她作了一次天主教女青年会情况的调查，在汇报时，有事实、有观点，条理清楚，头头是道，而且手里竟然没有稿子。她得到了当时的领导曾宪植的称赞，从此她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小孩称曾宪植为阿曾阿姨。她是个可敬可亲的阿姨，有着非常吸引人的与众不同的个性。我到现在也忘不了阿曾阿姨那双带着笑意但把人看得透透的眼睛，忘不了她的爽朗的大笑，忘不了她说话的简洁明快、一针见血。阿曾阿姨和妈妈之间很自然地建立起诚挚的友谊。阿曾阿姨不但带妈妈去看望自己的父亲，说妈妈是她的妹妹，而且，每逢过年过节她们一起去看望宋庆龄、夏娘娘、帅孟奇、林伯渠……我也曾有幸跟着一起去过夏娘娘家，去过中南海。妇联宿舍还住着一些单身女干部，工作之余，妈妈也常跟她们一起聊天娱乐。她们经常聚在一起，高歌“延安颂”、“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快乐地欢唱“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个朗里个朗里个朗……”我们姐妹俩少不了给阿姨们唱“扎红头绳”，跳新疆舞。记得有一次她们是一边跳着舞、唱着歌逛到东安市场的。她们朝气蓬勃，团结乐观，充满战斗的激情，使我们幼小的心灵也深深受到感染。同时我也听到过阿姨们善意地批评妈妈“主观、片面、机械、形而上学……”，使我过早地接触到了这些不好琢磨的哲学名词。妈妈从来都是虚心倾听她们的分析讨论，妈妈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和她们在一起讨论这些思想方法问题等于是补课。妈妈确实做到了她在自传里

写的：“以前的自信、自傲都动摇了，我要改造自己，低下头来，虚心学习。”她从不对我们讲自己的革命资历，我是妈妈去世后，看到她的生平才知道，解放时她竟有那么多头衔。过去，我只知道我们的父母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直到考大学填履历表之前，出身栏我都按妈妈的要求填的是“职员”，上大学后班主任说你父母都是老党员、老干部，你应该填“革干”。与此相反的是，妈妈一直让我们把亲戚中一串串右派名单，在国外的舅舅、姨的名单满满地填在履历表上。一方面，妈妈的“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给我们极深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也早早地烙上了我们是要被改造的那一类人的印记。妈妈自己低下了头，而且也让我们低下头来做人。

在1951~1958年期间，妈妈基本上都是做事务性秘书工作。遇到接待外宾经常加班加点不回家，还担负了几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秘书工作。那时，大量的人名、地名、电话号码，她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从不查阅记录本子。“文革”后期，妈妈为爸爸平反之事找到爸爸的领导张锦川，张五十年代当过中央机关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他见到妈妈惊喜之极，说：“你可是个出名的能干人呀！”想调妈妈到他那儿工作。直到现在，我还多次听到这样的话：“你是庞曾漱的女儿？你妈妈真能干！”妈妈那时候，从心底里愿意做党的驯服工具，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她的英语水平一直不为人所知，她也从不表现。六十年代，著名学者陈翰笙到妇联辅导英文，让每人写一篇作文，看完后，他对大家说：“你们大家写的都是中国英文，只有一个人例外，写的有英文味儿，那就是庞曾漱。”不过，直到今天，妇联的许多领导和同事仍然不知道妈妈这方面的能力。

1956年以后，妇联里不熟悉的阿姨的面孔渐渐多了起来，我们也搬出了妇联宿舍，曾经听说过妈妈要调工作，“向科学进军”，要调科学院。但后来，“支援北京市教育”，去中学当校长了。从此，我们几次跟着妈妈用一个三轮车就搬了家，住到她在中学工作的办公室里。

妈妈与阿曾阿姨亲密的关系，在机关里早就有所非议，甚至妇联书记们的党小组会上，阿曾阿姨都受到她的领导的批评。阿曾阿姨的回答是：“党的高级干部就不能和普通干部交朋友吗？”她对我妈妈说：“不去管它。”她们一直保持着情同姐妹的友谊。在妈妈调离后，我们在周末、假期仍然去妇联玩，甚至住在那里度过暑期寒假。

1964年，我国外交事业发展很快，周总理指示外事工作人员归队，妈妈就又调回了全国妇联国际部任西亚非洲组组长，我们搬回妇联大翔凤胡同宿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妈妈在1964~1966年期间，除去“四清”，我记得她接待过西南非洲妇女代表团、越南妇女代表团，还有一个法国小姐。接待法国小姐好像是有争议的，一会儿认为是个创新，是个好典型；一会儿又变成违反外事纪律，以至于“文革”中变成了妈妈“里通外国”的罪状。这说明妈妈做工作，从来都不会墨守成规的。

文 革

嘉陵：妈妈还没来得及在国际部做多少事情，“文革”开始了。我们只庆幸妈妈离开女六中，没有遭到红卫兵严酷的批斗。对于妈妈被关押批斗，好像早已有了准备，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思想右倾……因此，暴风骤雨来临之际，我们全家没有恐慌、没有无奈，从容地迎接这场风暴。

1966年6月初，妇联的斗争矛头已经指向了阿曾阿姨，要挖曾宪植大黑伞下的牛鬼蛇神，要像剥笋一样剥出曾宪植的黑心。就这样，妈妈作为大黑伞下的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关在二号的后院，完全与外界隔离，身上一切物品全被搜查干净，不能看报，不能听广播，还遭到看管人员的殴打。什么“白骨精、美女蛇、美蒋特务……”造谣、侮辱、抹黑，应有尽有。妈妈被看作非常危险的人物，1967年军管后，曾有一个班的解放军六位战士背着探雷器把我家探了一个够。

1966年冬天和1967年春天妈妈被放出来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她开始给我们讲她的家庭情况和经历，把她刚刚弄明白的“挫折”讲给我们听。1954年，她保存在抽屉里的党内学习文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丢失了，她写了一次又一次检查，还受到了党内处分，后又发现文件被人放回了抽屉，是谁干的始终是个谜，这不能排除有人故意整她呀！以后，她一直被停止阅读党内文件，这个待遇一直带到了在北京中学当校长期间。到“文革”她才弄明白，停止看党内文件还有另一个她所不知道的背景：我们在美国的二舅的一位朋友回国，住在新侨饭店，他打电话给妈妈，说二舅有事找她，让她去一趟，她便去了新侨饭店，向来人表示，向二舅问个好，没有什么事情要托来人办。出进总共几分钟。回来后没有想到要向组织汇报。但这个人受监视的，妈妈和他会面的事情被记录下来。

为此妈妈受到了内部处分——不能阅读党内文件，这也是“美蒋特务”的唯一由来。然而，这位新侨饭店的来人，在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期间却是姬鹏飞的座上宾。

要了解妈妈在妇联的经历和“文革”中的情况，是不能不提到阿曾阿姨的。在1967年春相对宽松的时期，妈妈极其活跃地进行为阿曾阿姨翻案的秘密活动。妈妈为阿曾阿姨找了一间隐蔽的住处，在崇文门大街9号隔壁一个商店门脸的楼上。阿曾阿姨的家属和朋友就可以在那里会面，传送材料。我曾去那儿为阿曾阿姨送过吃的东西。“反击二月逆流”之后，我妈妈又重新被关押在史家胡同54号中国妇女杂志社，我们只能去送生活用品，不能见面。如果送些吃的，那就要遭到“划不清界线”的训斥。这也是我毕业分配前“斗私批修”的一条罪状。

1967年初，阿曾阿姨和妈妈的这一系列秘密活动，无疑是现行罪状。1973年妈妈从干校回来，我带着一岁的儿子回北京，妈妈跟我又讲起此事。说在干校时，她通过一个镜子反射看见了隔壁看守她的人在抄写东西整理材料，并把不用的纸撕了丢在字纸篓里。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些碎纸片拿了出来，在手电的灯光下拼了起来。发现就是1967年初那些活动的日程表。时间、内容都写得清清楚楚。她就明白有人已经全部彻底交待了。这样她也就交待了一些事情。我问：“那你这不也是出卖阿曾阿姨了吗？”她说，她是认真考虑过的，这样做使专案组有了旁证，就可以早日结束对阿曾阿姨没完没了的审查，她交待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1973年从干校回来，阿曾阿姨还没有平反落实政策，她们仍然有来往。妈妈印发了几十张召开费巩教授纪念会的倡议书，就是阿曾阿姨与妇联印刷厂老职工打招呼后印制的。

后来，阿曾阿姨完全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恢复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离开了妇联。妈妈很快敏感到周围的人对自己冷淡仇视的态度，她明白这肯定来源于全部彻底交待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所为转嫁给妈妈了。为此，妈妈就再也没有和阿曾阿姨来往，甚至没有去参加阿曾阿姨的追悼会。这是我替妈妈唯一的遗憾。“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乱咬人、瞎揭发的事层出不穷，都能得到人们的谅解，而妈妈一辈子诚恳待人，从来都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却默默地承受了巨大的误解。我们相信妈妈决不会做出卖人的事。从来做事问心无愧的妈妈不愿为了洗刷自己再说什么，只把它变成心里一块永远不愿触及的东西。我只希望

妈妈与阿曾阿姨见面时，她们仍会像 50 年代那样高歌欢唱，重温纯洁无比的同志情谊。我们尊敬和怀念可敬可爱的阿曾阿姨，我们珍惜妈妈和她之间真挚的友情。

妈妈还和我谈了她在干校的深刻感受。她说，真没想到，有些昔日她所尊敬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没有了权力的光环之后，灵魂深处的自私、狭隘，甚至是卑鄙、低下，暴露得那么淋漓尽致。她还反思说：明明是人嘛，为什么要做工具？还是驯服的。要知道，“驯”字的偏旁是“马”呀。我想，这个时候，妈妈一定重新找到了自信，抬起了头，破除了对那些“马列老太太”们的迷信，精神上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她的生命便重新发出了她固有的光彩。

1976~1980 年正值大批干部平反落实政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她一个一个地恢复了和昔日亲属、同学、朋友的来往。那时她真是“上窜下跳”，为很多人写材料、递送材料，因为她可以把材料送到王震和胡耀邦那里。我们那时还都没有调回北京，儿子放在北京由她照料。1977 年我回来生女儿时，她没完没了地给我讲了很多她经手的为人平反的“案例”。由于这些人我不认识，具体的人名和事情都遗忘了。值得一提的是，她从没给自己写过什么申诉和平反要求，连抄家物资都没有坚持退赔。

朋友们又都很关心，为什么妈妈级别这么低？一个 1942 年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参加革命，无论从资历、知识、能力、贡献哪方面，都不应离休时只有 15 级，遇到这样的问题，妈妈只能一笑了之，对亲近的人便说：“我让了。”

我们了解的实际情况是，妈妈调到妇联时，档案上将秘书长的职务填写成了秘书。因此，在取消供给制定级别时定为 17 级。为此，她的振华校友叶梅娟（上海地下党员）还主动将自己的级别要求降到 18 级。后来组织上发现了这个错误，但只好下次调级再处理。在第二次提级时，上报妈妈提二级，但到最高领导处（也是批评阿曾阿姨与妈妈交朋友的）给否决了，说庞曾漱不要太特殊。那时阿曾阿姨是妈妈的好朋友，就无法为她争辩了，于是就只提了一级，16 级。在女六中时期又碰上了提级，生活困难的老师很多，尤其是年轻教师。本来妈妈又可以提级的，她却把自己的指标，给了老师，使两个教师提了工资。当时妈妈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还跟我们讲，要艰苦朴素，生活上不要有奢求。这样妈妈仍然带着 16 级回到妇联，“文革”后，大家一起提级为 15 级一直到离休。“文革”后，

她从国际部到罗琼领导的妇女运动史组工作过，后来又被“保卫妇女儿童委员会”调去做副秘书长的工作，一干又是几年。当时没有正式任命，但几个领导都谈过她是副秘书长，可是不久却宣布再成立一个秘书处，仍然让她当秘书处长。这次妈妈没有再做驯服工具，出国探亲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全国妇联，到社科院青少年所做国外青少年研究工作。但由于年事已高，还没来得及有所建树，就离休了。对于级别职别，妈妈看得很坦然。她说：“比我有能力、有贡献而遭遇比我差的人有的是，有人甚至失去了政治生命和性命，和他们比我受的委屈算不了什么。”又说：“我本来参加革命就没有想要地位、级别，他们给与不给，和我自己的初衷无关。我为什么要情绪？”所以她离休后完全是轻装前进，投入到新的战斗生活中。晚年过得充实、热闹、受人尊敬。

从妈妈的自传中我们看到，她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人道主义和追求社会公正。很多追求社会公正的人，出发点是为索取个人利益、改变自己的不平等地位，而妈妈一开始就以牺牲个人、贡献社会为己任，以此来实现社会公正理想。

忆陵：文革中，1971年7月，我背着一个沉重的大旅行包出发了。我要去看我全家的人。到河北衡水看妈妈，到河南确山看爸爸，再到新疆鄯善去看姐姐。妈妈是“美蒋特务”，爸爸是“反革命、假党员、走资派”，姐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正在“接受再教育”的食堂炊事员。大背包里装着40斤米和许多要带给大家的東西。我这个体力强壮的姑娘也不得不常常找地方靠在墙上，借背包与墙面间的摩擦力松一下勒得生疼的肩膀。

从衡水县城到妇联的五七干校疙瘩头村要走五六里路。背包是沉的，但我的脚步是轻快的，我很想看看妈妈。自从“一号命令”发布，妈妈被关押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妇联干校是一个有着四面围墙的解放军的营房。向连长指导员之类的人物（都是以前妇联的阿姨）通报之后，她们显出很认真防范的表情。经研究，让我和妈妈见面，她们中的一人在一边旁听。妈妈见了我非常高兴，她的气色还好，穿着缝补得整整齐齐的干净的旧衣服。这种叙谈由于有外人在场，几乎记不得谈了些什么。在那一天里，我只有一小段时间和妈妈单独在一起。妈妈除了干农活，还得给食堂烧火，不知是因为吃饭时无人看管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我有机会到灶

间和妈妈单独聊了一会儿。这段时间的会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妈妈兴奋极了，老看着我像是看不够似的，笑得非常开心。她一边用长把的铁铲往灶眼里加煤，一边招呼我和她一起摘旁边的菜（她总爱同时做好几件事）。而谈话的内容，几乎全是她认为有趣的，成功的，巧妙的事，边谈边笑，得意极了。她告诉我怎样加煤能让火旺而用的煤最少；她给我看她边烧火边用废罐头盒、小药瓶及各种废料做成的煤油炉；还告诉我，因为她同情“走资派”，有一回罚她三个月不准吃菜，她就悄悄托人从外面买了包味精，靠盐水加味精过了几个月。“我知道味精的成分，这样就有营养了。”她仍然很高兴，甚至不无得意。这就是我的妈妈。要知道，我们几年没见面了，而这次又是短短十几小时的相聚。她一句愁苦抱怨的话也没说，显得那样乐观，活得津津有味。到了晚上，由于妈妈还处在被看管状态，我和她必须分开在两间屋睡觉。我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时就得起来去赶火车，抽空给妈妈留了一句话：“如果你还想跟我说什么，我早上五点到厕所里等你。”清早，天还没亮，我打点好行李，站在黑漆漆的厕所里，透过厕所的砖孔，望着那排营房中妈妈住着的那个窗口，那里始终没有灯光，没有人出来，我等着，等着，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在那“革命”的年代，我已接受了这“颠倒的乾坤”，所以那时我心里并不是悲伤和气愤，只是一种莫名的伤感罢了。天蒙蒙亮时，我恋恋不舍地看着妈妈那个窗口，背起我那沉重的背包，在清冷的农村的晨风中，向下一个亲人的目标走去了。

“投岩麝留香”

做教师，似乎是妈妈的天职。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便是到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去教书。抗战胜利后，妈妈先后在苏州振华女中、无锡辅仁中学和竞智女中教过书。若不是解放初期妈妈被帅孟奇从电力部教育口调到全国妇联，恐怕妈妈一辈子都会从事教育事业的。到全国妇联后，她仍与教书有着不解之缘，从1958年到1964年，她在全国妇联调到北京中学教育口，先后在28中、98中和女六中工作过，打倒“四人帮”后，她又到中科院古脊椎所教过英文。

妈妈天生是个好老师。她对知识的好奇、求索和积累，她对人的理解、关怀与感悟，加上她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使受过她教诲的人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忘年交”、“小朋友”，也与此有关。我们的

孩子们也喜欢跟姥姥聊天。妈妈善解人意，对孩子们的想法在理解的同时加以引导。所以十六岁的外孙高猛跟姥姥谈完话后说：“姥姥是一个大宝库。”指的是妈妈在人生经历、思想方法、处理问题的经验上都有很多独到的东西，而且不保守，很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感染。我们的朋友中一些忙碌的企业家、经商的人，也愿意来找妈妈谈话。妈妈关心他们，能关心到别人不常关心的问题。同时，妈妈思维活跃、求知欲强，虽未在商场上做什么，但常有精辟的见解令人心服。这些朋友说：“跟庞阿姨聊天有意思。”妈妈的去世也使他们黯然神伤。一个叫张鸣的“忘年交”说：“再也找不到那样一个地方去聊那样一些话题了。”是他用“为了未来她贡献了青春，为了过去她贡献了晚年”这两句话概括了妈妈的一生。

从1960年到1964年，妈妈在女六中工作了四年。女六中的老师们回忆起妈妈时说了一句话：“再没见过第二个像庞校长那样懂业务的校长了！”妈妈当时担任女六中副校长，而正校长是个“老资格”，常年有病，因此学校的担子实际上全落在妈妈身上。她除了当校长，还担任高三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课，还当班主任。她说过，不教课就不能深入了解教学，不当班主任，就不能真正了解学生。除此之外，她每周要用很多时间听课，各门学科的课都听。她管理学校的能力给当年的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庞校长计划性强到了精确的程度。每周一次行政会，所有问题当时解决；按时开支委会，全部有详细记录；干部们各负其责，积极性很高；大家都很团结，一心把工作干好。”她到女六中一年后作过一个总结报告，言之有物，头头是道，逻辑性强，充满感情，老师们很欢迎。有人说：“我到女六中这么多年，从未听过这么懂教学的人的报告！”大家信心大增，觉得女六中这个学校很有希望。妈妈上浙大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物理系，因此她的数、理基础很好；后来她从外语系毕业时还是高材生，英文、中文的水平都很高；在育才身受陶行知先生的教诲；在苏南又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妈妈是很具备一个中学校长的全面素质的，是可以在教育战线上创造很好的业绩的。

可是，在妈妈全身心工作的同时，一些以“党的化身”自居，一贯整人的领导，一边在家休息，一边向上反映：庞曾漱“篡党夺权”，“不尊重党的领导”，“骄傲自满”，“独断专行”，“不走阶级路线”……及至1963年下半年区委教育部专门派调查组调解所谓的“x庞之争”，最后不了了之。有当时的老师回忆此事时说：“就记得那边是一大堆的帽子，而庞校长是一件件事，时间、地点、

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让人佩服。”据说向群众调查的反应都是：一个工作，一个不工作；一个夜以继日，一个在家休息；一个“错误”一大堆，一个是“党的好干部”。结论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忆陵：妈妈在女六中工作时我上了初中，比较懂事了。我们一去就住在学校里，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家”的概念，办公室的一个小里间就是我们的“居所”，后来才搬进一个两头是门、长长的类似过道的房间。对妈妈来说，学校就是家，家就是学校。平时是工作日，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开会日，不是区里开会就是市里开会。我真的回忆不出那时我们的房间里有什么家具，更回忆不出什么闲暇的家庭生活场景。我的印象就是大人忙工作，孩子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妈妈问我：“你几年级了？”我说：“初二。”她对工作真是全身心投入。我记得好几次晚上我已经睡了，在被窝里听她和学生谈话，学生有时还抹眼泪。什么学习啦、思想啦、考大学啦，恋爱啦，什么问题都有，妈妈总是耐心细致、娓娓长谈。妈妈爱学生，工作很细致。有一次流感盛行，大约由于妈妈是出身名医之家，卫生常识多一些吧，她在女六中各班设了盐开水桶，每个学生上学都要用自带的杯子取盐水漱口。结果，那年她们学校就没什么人患流感。提起这件事，妈妈对我说：“其实有些事不难做，就看你肯不肯做。”妈妈对华侨学生特别关心，说她们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远离父母，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人连将来孩子用的尿布都带了，可见决心之大，她们的爱国热忱十分可嘉。妈妈关照学校各方面从生活上照顾她们、关心她们，包括她们的升学、就业种种问题。我印象里妈妈还非常关心年轻教师。她为了办好女六中，特别到北京市去要了一批复旦、华东师大的应届毕业生。妈妈非常爱才，她知道，要办好一个学校，师资的水平是最重要的。我记得，妈妈一谈到某个老师人如何聪明、课讲得如何精彩时，总是眉飞色舞的。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妈妈很爱护他们，经常跟他们聊天，鼓励他们进步；有些老师生活困难或离家远，妈妈总是想办法帮忙；尤其是过年过节，怕他们寂寞，跟他们一起会餐、娱乐。在女六中，妈妈没日没夜地工作着，还正值困难时期，她长期浮肿……

回想妈妈在女六中工作够几年，承担那么大的工作量是要有多么热忱的信念和强烈的责任心啊！可是比吃不饱、营养不良更可怕的是当时的极“左”思潮。

在那个极“左”的、是非混淆甚至颠倒的年代里，本来具有很好的素质可以成为一个德高望重、成绩斐然的好校长和教育家的妈妈，没有能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展现出来。事过几十年，我们反而只能庆幸她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调回了妇联，否则，很可能难逃北京好几个中学校长在红卫兵手里的厄运。

妈妈最后一次执教是1978年前后到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英文。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始，一大批三十多岁的科技人员因“文革”耽误了学业，迫切需要补习英文。妈妈从干校回来后，被妇联分配在“保委会”工作，在古脊椎所周明镇教授的推荐下，闲不住的妈妈就到这里当了两年多的英语老师，工作性质是义务的。被妈妈教过的学生现在都五六十岁了。用他们的话说：“经过这段学习，我们的英语水平被庞老师狠狠地向上提了一大块。”他们对庞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口语特棒”。而且她曾说明：“我的发音不是从字典上查出来的，是从美国人嘴里学来的。”一个当时和妈妈争论过发音的学生后来到美国工作，发现按庞老师的发音美国人都懂，按字典上发音，美国人先要愣一会儿。他们对庞老师纯正的美国口音非常佩服。

学生们对庞老师更深的印象还不是来自英语学习本身。一个学生说：“庞老师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一看就能感到有着很好的家庭教养和文化修养。这种气质，穿得再好，也是学不来的。”他们说庞老师心地善良、做事非常认真、对学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没上课前，学生就围着庞老师问问题，下了课，还是一大堆人围着，庞老师非常耐心、慈祥、有求必应。当时学生程度不齐，妈妈很能理解学生的需要，采用因材施教法，给不同程度的学生讲不同的知识。记得那段时间妈妈认真备课，对我们说过：“外语丢了几十年了，还要记大量古生物方面的单词，还是蛮吃力的。”由于这二十几个学生都有出国、考核等任务压着，妈妈还在晚上加班为他们上课。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能体现她的心灵和素质，妈妈在古脊椎所短短的教课生涯，竟给那些学生留下“她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的印象，说在妈妈身上“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没有丢”。可敬的沈从文老在谈到自己的人生观时，用“投岩麝留香”来做比喻（麝被逼到悬崖边无路可走时，要掏出自己的麝香，洒遍大地，自己才身亡）。被妈妈教过的学生们说：“我们觉得庞老师也是这种人中的一分子。”■

2014. 11. 5 整理

【资 料】

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猛烈开火

彻底清算十七年来高教工作上的修正主义黑线（初稿续完）

高教部《北京公社》红岩战斗队

高教部七一战斗队

第三个时期

（1958年4月至1964年2月）

普教、高教合并为一个部。杨秀峰任部党组书记，1959年以后蒋南翔任副书记。

第三个回合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1958年，毛主席亲自点燃教育革命的熊熊烈火。随着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教育革命蓬勃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受到猛烈的冲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摇摇欲坠。这个时期，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十分剧烈。

毛主席点燃

教育大革命的烈火

1957年2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制订了我国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同年3月，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展开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1958年，毛主席又亲自发动了教育大革命，作了许多指示，强调“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

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教育战线上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出现了大量的新生事物。半工半读的学校相继创设了；全日制学校开办了许多工厂、农场；学校的教育开始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广大师生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三秋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同时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在这期间，各校都进行了教学上的改革，师生结合编写出大批的新教材。高等学校中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刘、邓的支持下，彭、陆、杨、蒋，
吹阴风，放暗箭，进行猖狂反扑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首先带头唱反调。早在1957年11月，他就鼓吹什么“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公然同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相对抗。1958年9月，他又叫嚷“应该出大学生、出教师、出工程师、出干部”，就是绝口不提出劳动者。1959年，他又发出“认真读书”的号召，把刚刚从书堆里拔出来的青年又赶回书堆里去。1958年9月，邓小平也配合刘少奇，叫喊说：“大学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教学内容，全力做好尖端科学的研究和实验。”故意贬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在刘、邓的支持下，彭真、陆定一、林枫、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我国的教育大革命视为洪水猛兽，深恶痛绝。他们吹阴风，放暗箭，搞阴谋，千方百计进行反扑。彭真在1960年祭起了“未立不破”的法宝。1961年4月陆定一、周扬制订了修正主义的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全盘否定58年教育革命成果，这是在高等学校文科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纲领。陆定一还在1961、1962年跳出来说什么：“谁要办白专学校，我批准”，“中国医科大学的办学方针是‘老协和’加政治课”，“教育方针提出不久，有许多同志不满意，左的东西就出来了。……认为共产主义学校必须搞半工半读，……认为劳动愈多愈好，愈多愈共产主义”。他还叫嚷：“武汉大学也搞了一个系，实行半工半读，全国还有

什么全日制学校”；他赤裸裸地宣称：“很多大学搞改革，我采取观望态度，中央文教小组从来没有提倡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没有立起来以前，就砍掉了不行”；并且恶毒地攻击说：“教学质量提高了，我怀疑，有所提高有所降低吧！着重是有所降低”，“搞科学研究的同志面黄肌瘦，脸青眼黑，女同志像个熊猫一样，眼圈是黑的，这样不行”。

以杨秀峰为首的教育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教育大革命兴起时，抱着抵触情绪，冷眼旁观。但当刘、邓、彭、陆发出反扑的讯号时，立刻活跃了起来。1958年底，杨秀峰勾结苏修专家大肆攻击教育大革命，借苏修顾问之口，诬蔑“年轻人过分狂热”，叫喊“出现有降低教师作用的倾向”。1959年，部党组正式提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口号，来和“教学秩序搞乱了”的污蔑相呼应。刘皑风（当时的副部长）在当年暑期青岛工科院校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提出了要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问题，要院校长回校进行工作。1961年，在陆定一的授意下，杨秀峰亲自到天津大学蹲点，搞草拟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的准备工作，并亲自研究确定了学校内的领导体制问题。随后，蒋南翔积极主动地组织草拟出《高教六十条（草案）》，经部党组讨论后报中央。在刘、邓和彭、陆的支持下，以中央名义，发布试行。这个条例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它否定了1958年教育大革命，恢复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一套，削弱了党对高等学校的绝对领导；抹杀了高等学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鼓吹了智育第一，书本知识至上；宣扬了政治落实到业务的修正主义观点；歪曲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只强调团结，不抓教育和改造，恢复了专家路线。

高教战线上的一次大反复

随着《高教六十条（草案）》的下达试行和教育部的一系列修正主义措施，高教战线上出现了一次大反复。

第一、学校的领导权又落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抓党的领导。这是高等学校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但是《高教六十条》却明文规定系的党总支

委员会只是“保证和监督系务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和本系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只“可以就本系的工作问题，向系主任和系务委员会提出建议”。系务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系主任基本是一些老教授。教育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新生力量纷纷下台，有些学校规定副教授或讲师以上教师才能做教研室主任。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基层领导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抓权，教学、科学研究问题不让党支部、党总支过问，有的甚至公然叫嚣说：“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有的在教室内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想尽一切办法排挤党员。

第二、大大削弱了政治思想工作

通过教育大革命，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局面是打开了，师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1961年以后，杨秀峰等大开倒车，他们平日只抓业务工作，不抓政治工作，对学校的阶级斗争不问不管，甚至连原设的政治教育司也取消了，改设为一个处。并且在《高教六十条》中降低对师生的政治要求，对学生“红”的要求只提“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只字不提知识分子的思想革命化和劳动化。同时，还规定“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的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宣扬“红落实到专”的修正主义观点。政治课方面，大跃进时期革命师生创造的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正确做法被否定了，又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老一套，强调所谓“认真读书”，“学习理论知识”，甚至秉承旧中宣部的旨意，一度又搬用苏修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奉若“经典”。教育部的所作所为，使得“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政治是招牌，业务是实力，福利是目的”等修正主义思想大大滋长起来。有些师生又每日钻书堆，不问政治，朝白专道路发展。

第三、一风吹，大下马

1961至1963年期间，在所谓提高教学质量的借口下，资产阶级的“正规化”思想又大大抬头，几乎把教育大革命的成果砍光了。教育部在一次清理口号的时候，把有些革命的经验、革命的措施不加分析地否定了。这期间，1958年群众

办的学校，特别是半工半读学校大量被停办了或者改为全日制。21所半工半读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停办了，只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个别学校，艰苦地维持了下来。大学办的工厂、车间、农场纷纷下马，不少学校干脆把劳动基地一风吹掉；有些必需的新设专业被砍掉了；许多应该坚持的科学研究工作、技术革新工作中断了。总之，教育与生产劳动又分离了，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局面不见了，不少高等学校又出现了冷冷清清的脱离实际的“学院式”情景。

第四、复辟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1961年以后，教育部在大抓全日制、大抓重点学校、大抓“提高质量”、大抓“以教学为主”、大抓“稳定教学秩序”的幌子下，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急急忙忙复辟了被1958年教育大革命所冲破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1957年明令停止试行的《教师工作量、工作日试行办法》这时又重新捡了起来；《考试考查规程》换汤不换药又出了笼；专业划分基本上又恢复了苏修的目录；教学计划的安排，除加了一些劳动外，和1954年以前没有多大的区别；教学大纲又回到1954年的老样子；教材基本上又按照老教学大纲编写，不少教材内容繁琐陈旧，脱离实际，“三个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观点不少。

第五、恢复和发展了专家路线，鼓吹阶级调和

在这段时间内，杨秀峰等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备至，一再强调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和专长，而对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不加批评。蒋南翔一再叫嚷“在高等学校中，党员干部必须和党外专家合作，实行两种人的会师”，又说：“要团结百分之百的教师”。旧中宣部和教育部对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特别欣赏，在政治上抬高他们，业务上依靠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在1962年一年中，再度安排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担任院校长，抬高他们的政治地位，翦伯赞、傅鹰等就是这时候安排的。自1961年起，在彭真直接指使下，杨秀峰、蒋南翔具体策划组织了一大批全国性教材编审委员会，网罗了全国所谓名教授、名专家。黄辛白还说什么“苏联、美国都没有，是中国的独创”。从此，修订教学计划、审订教学大纲、编制教材工作规划、审编教材又都交给他们去搞，资产阶

级专家又控制了高等学校的教学大权。当时还规定，不是教授、副教授，不能指导研究生，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必须由老教授挂帅。教育部召开的会议，常是资产阶级专家云集的场所。这些人的工资本来就很高，杨秀峰、蒋南翔等领导人还为他们锦上添花，用物质刺激他们的“积极性”。例如在《关于做好今年应届毕业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工作的通知》中规定：聘请校外专家评阅论文的酬劳金，暂定每篇30—50元。编写教材的稿费也一再提高，教材稿酬由每千字6—12元提高到8—16元，并且还企图搞印刷稿酬，为他们广开财路。

第六，只专不红的师资培养路线， 为造就精神贵族制造“工作母机”

1962年11月、1963年2月，由刘子载（当时副部长）主持，在武汉、沈阳分别召开了培养师资问题座谈会。这两次会完全是贯彻《高教六十条》中修正主义的只专不红的师资培养路线。会上对教师在政治上的要求只提：“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对教师业务上的要求，说什么“应该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执行”。刘子载在会上对红专问题还公然鼓吹“一个时期着重抓红，一个时期着重抓专，不同时期可以有所侧重”。另外，会上还布置各校制订师资培养规划，硬性规定在规划中要提出几年内多少人达到讲师，多少人达到副教授、教授。会后，许多高等学校都照此办理，有的学校并且公开在教师中安排落实，名位思想很快又滋长起来。因此，这两次会对高等学校教师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这几年，对师资的选拔只看业务，不看政治；对师资的培养，也不抓政治，只抓进修，抓读书，不组织教师下厂矿、下农村，让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锻炼成长，放弃了对他们思想革命化和劳动化的要求。许多学校还根据教育部的布置，在培养所谓骨干教师的工作中，把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列入了骨干培养计划，并说什么要把他们迅速培养成为学术领导人。至于青年教师的所谓进修，也是单纯提高业务，不少人脱产到“名牌”学校跟知名的资产阶级专家学习，接受资产阶级专家的“熏陶”和“熔化”，准备培养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对教师职务的提升也是着眼于业务，强调外语、科学论文和著作。这种修正主义政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少教师只埋头学外文，搞科学研究，脱离

政治，不愿参加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不肯参加生产劳动。对提升教师的业务审查，高教部明文规定：“对被确定提升职务的教师，所在教研组的领导必须就其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作出详细具体的分析和鉴定，并负责签名盖章”，“对被确定提升职务的教师的主要论文著作……事先必须请校内有关单位的两名或三名同专业的水平较高的教授、专家进行仔细的审查，提出书面的审查意见。如校内缺乏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请校外专家帮助审查”。这样，提升教师的审查大权，实际上就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里。当时，有些学校在教师中流行着所谓“四个一”，即开一门课、学一门外语、编一本讲义、写一篇文章。有些教师认为有了这四个“一”就可以顺着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路子爬上去。

对于师资的重要来源之一，研究生的选拔和培养也是只抓业务，不抓政治。研究生的培养采用所谓导师制，并规定导师可以选择学生；学生可以选择导师，导师和学生要建立密切合作的关系。有些资产阶级教授趁机争夺青年一代，帮助他们找爱人，发表文章给他们挂个名，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不少研究生跟着导师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生产斗争，甘心情愿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当资产阶级接班人。这种培养研究生的办法可以概括为“五个一”，即一个学生、一个导师、一个题目、一篇文章和一门课程不及格退学。

第七、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排斥工农子弟

这一时期，从招生到校内学习都是分数挂帅，强调学业成绩，不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1962年招生委员会取消了工农子弟优先录取的规定。当年由蒋南翔提出经党组同意的招考新生的办法中，明文规定“录取新生的办法，应该按照考试成绩的高低和考生报考志愿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分段进行录取”。录取时，先看分数，分数够了才看政治条件，甚至完全不考虑政治条件，高分段没有录取完，不准看低分段，把大量政治条件好、考试成绩略低一些的工农子弟排斥在高等学校大门之外。

1962年，杨秀峰、蒋南翔等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借口，重新颁发了一个学生成绩考试考查的办法，学生的升级、留级、退学，完全以学业成绩为标准，并且宣扬什么“考试成绩，不仅是衡量学业程度的标准，而且通过成绩，还可以看出学生政治品质的高低”，这就大大支持了“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的谬

论，并使它合法化了。有一些资产阶级专家以这个规定为武器，打击和排斥工农子弟，迫使一批学业基础较差的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留级和退学，这方面的数字相当惊人。有些学校竟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考考考，是老师的法宝；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反映了当时高等学校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考试为武器，摧残青年，进行阶级报复的状况。

1963年，蒋南翔还大力鼓吹培养所谓“拔尖人材”，并首先在××大学实行。他的所谓拔尖人材的培养，就是选一些业务上的“尖子”，进行精心的培养，企图把他们培养成为资产阶级可靠的接班人。以后，蒋南翔又在高教部直属的重点学校中推广。1964年，蒋南翔又搞了一个优秀毕业生的选拔办法，把那些所谓“高材生”分配到重点单位、科研机构 and 高等学校去工作。1965年，邓小平和彭真还督促蒋南翔大抓所谓优秀生跳级跳班的工作。这些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做法，大大助长了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

第四个时期

(1964年3月至1966年6月)

普教、高教又分开为两个部。1965年以前，杨秀峰任高教部党组书记，蒋南翔任副书记。1965年以后，蒋南翔任高教部党委书记，刘仰峤任副书记。

第四个回合——

坚持革命和反对革命的斗争

1964年春节，毛主席再一次燃起教育革命之火，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春节谈话。不久之后，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随即，广大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又开始进行教育革命，再一次冲击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

盘踞在高教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的号召阳奉阴违，对于学校的革命行动百般阻挠，压制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揭发。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使用种种花招，顽固地死守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堡垒，在革命

形势面前作垂死挣扎。

毛主席再一次点燃
教育革命之火

1960至1963年教育界的大复辟，是当时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继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于1964年2月发表春节谈话，对教育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在春节谈话中，毛主席深刻地揭露了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矛盾，指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问题，指示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必须改革。同年3月10日，毛主席在铁路二中报告的批示中再次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9月，毛主席强调指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明确指出学生应该参加一期“四清”。后来，毛主席还强调指出过现行教育制度对青年的毒害。1965年7月3日，毛主席批示团中央报告时，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8月，毛主席在接见某代表团时又指出，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1966年5月，毛主席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明确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这一系列指示，给刘、邓、彭、陆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致命的打击，重新燃起了教育革命的烈火。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高教战线的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纷纷起来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热情地学习解放军院校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教学的经验，开展教学改革。高教战线上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

刘、邓、彭、陆
带头反对最高指示

刘少奇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8月，他突然到八个省市大讲两种教育制度，绝口不提毛主席的春节谈话。1965年11月，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先是假惺惺地说：“全日制学校改革也要抓”，接着含沙射影地说：“看不准，千万不要瞎指挥”，带头反对最高指示。

在刘、邓的支持下，彭真、陆定一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他们继1960至1963年大反扑之后，又一次在高教战线上兴风作浪，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反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春节指示以后不久，陆定一亲自出马，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扩大）领导干部会议上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革命的号召，说什么“革命革下去会碰到困难，国内如此，国际也如此。国内陈独秀、王明失败过；三年灾荒、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也失败过。以后肯定还会失败，可以写保票。”对于毛主席提倡的半工半读他们也想方设法进行抵制。彭真在1964年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叫嚷：“原子弹上天，还要靠全日制。”1965年9月，陆定一也叫喊：“今天我看到江西的同志写给总理的一封信，要求让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扩大招生。……我看这样不行。是否步子太大了？千万不要一哄而起。”彭、陆在对毛主席指示冷嘲热讽的同时，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大泼冷水。1964年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上，陆定一冷言冷语地说：“至于高等学校，对不起，没有经验。要有经验，是否还要十年？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毫无经验，一点办法没有。”陆定一还张牙舞爪，大反所谓教条主义。1965年6月9日，他在给许立群、童大林的信中，极其恶毒地向毛主席射出一支毒箭，说什么“必须同教条主义坚决斗争。认识教条主义之害，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清楚的，要慢慢地来，一步一步认识，一步一步前进。”他还叫嚷解放军经验不能搬到高等学校。同年10月，陆定一在高教部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目张胆地抵制毛主席的“七三”指示，说什么：“只讨论一个减轻学生负担，减少课内外活动问题，恐怕太窄了”，还污蔑说“这次会议讨论的全是鸡毛蒜皮，没有突出政治”。

盘踞在高教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甘心灭亡，作垂死挣扎

这一时期，以蒋南翔、杨秀峰为首的高教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彭、陆的指挥下，坚持前一时期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政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研究生、师资培养、招生以及事业计划等等方面，竭力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大反教育革命。这一时期中，他们图穷匕首见，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直接指向毛泽东思想。

第一、抵制毛主席春节谈话指示，阻挠教育革命

毛主席在1964年春节，专门就教育工作问题作了指示后，杨秀峰、蒋南翔装出雷厉风行的样子，于3月底召开直属高等学校（扩大）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杨秀峰急急忙忙地抛出了“思想积极，行动稳妥”的口号，妄图以此束缚群众的手脚。4月20日，部党组会议上，蒋南翔进一步发挥“稳妥论”，射出了抵制最高指示的四支暗箭，他说：“第一，改革是一个复杂问题，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第二，大学的改革要与中小学改革联系起来；第三，形式上左，不解决任何问题，有思想问题，不能作为两条道路的斗争；第四，改革有学术问题。”最后，他归结为“教学改革，是长期的复杂的”，以此拖延不改，阻挠教育革命。杨秀峰还伙同蒋南翔玩弄两面手法，狼狈为奸。他们在3月领导干部会议上，一方面布置进行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又指使黄辛白出面，在会上提出“三不动”即：学制不动，专业设置不动，教学计划的大框框不动，来与毛主席的“四改”指示相对抗。与此同时，蒋南翔在会上，还别有用心地抛出了清华、南工的所谓贯彻“少而精”原则的经验，妄图以“少而精”，把广大师生的视线局限在一门课程的狭隘范围内，放松对学制、课程门类和专业设置等重大问题的注意。之后，蒋南翔在呼和浩特会议上，又进一步玩弄花招，提出什么大、中、小改，并且假惺惺地说：“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阿Q感到莫大悲哀，我们要允许革命。”实质上，是万变不离其宗，仍旧是只搞改良，不许革命。就在这次会议上，蒋南翔的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他们公开宣称：“理论教学时间要保140周”，说什么“这是最后一道防线”，而且公然污蔑冲击旧教学计划的革命主张为“干擦屁股的事”。

关于学制问题，林枫和蒋南翔等进行了许多策划，只想从儿童提前入学和中

小学上打点主意，死死抱住高等学校的年制不肯动。蒋南翔说什么：“劳动要增加，军训社教要加进来，又要学制短一些，怎么办？”“减了时间，能不能提高质量？”。他竟然叫嚷：“军训挤入，再加劳动，多数四年制，就是有问题。”对于半工半读问题，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来以后，杨秀峰等人不闻不问，但是到了1964年刘少奇抓他的所谓半工半读，他们忽然“积极”起来。杨秀峰几次把刘少奇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并提，说什么“两位主席如何指示”。蒋南翔则是根本抵制毛主席提出的半工半读，一方面，规定进行半工半读试点的学生，只准占招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并且限制直属学校试点班在一校只办一两个专业，已经上了马的专业，也只好陆续下马。如浙江大学提出要试10个点，蒋南翔知道之后，暴跳如雷，交待打长途电话予以申斥，迫使该校由10个缩为7个、4个，直到2个。清华大学办的试点专业，蒋称之为“防御部队”，不过是应付舆论摆摆样子而已。另一方面，蒋南翔大抓毕业设计，大搞科研成果展览，炫耀全日制的成绩，并散布“全日制也要将半工半读的军”的言论，企图扼杀半工半读。

在杨秀峰、蒋南翔等人千方百计地阻挠教育革命的罪恶活动下，高等学校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被压抑，革命的首创精神被扼杀，革命的行动被打击。从毛主席春节谈话指示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学制没有动，课程基本上没有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也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一句话：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没有贯彻执行。

第二、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习解放军

毛主席著作是革命的宝书，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1961年，彭、陆、杨、蒋等就攻击在教材上引用毛主席著作，是“贴政治标签”，“简单化、庸俗化”，一直不在高等学校和高教部机关内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全国人民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的时候，他们又跳了出来，大肆攻击高等学校的语录进课堂。1965年5月的一次部长办公会议上，蒋南翔污蔑学毛主席语录是“形式主义”，并恶毒地诬蔑说：“不能把主席语录当白莲教符咒来念。”他并且指使部内干部广为收集所谓“引用不当”的例子，作为攻击语录进课堂的炮弹，汇编成教育简报（第22期）。污蔑

北京机械学院等校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经验是“形式主义”，竟然说教师是不愿意干的，提倡语录进课堂是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当一机部教育局××抵制这种诬蔑时，蒋南翔还向一机部党组告了××一状。同年7月，黄辛白在工科基础课教材工作座谈会上，亲自带头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在他的支持下，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南工吴大榕污蔑说：“教研组开会前学语录，像做祷告一样。”清华何东昌继而恶毒地攻击说：“现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两个落实，一个落实到口头上，就是语录教学；一个落实在屁股上，就是坐班制。”黄辛白恶毒地讽刺说：“这不成了猴子屁股了。”另外，他们还在政治理论课中始终坚持开几门课的体系，不把毛主席著作作为主要教材。他们就是这样污蔑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使得高等学校学习毛主席著作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

毛主席在1964年发出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以后，地方院校的革命师生纷纷学习解放军院校的经验，在1965年春掀起了一个大学解放军的高潮。这时，蒋南翔与陆定一互相呼应，大肆攻击，说什么：“解放军院校的经验，不适合于地方学校。”他们对于各校大学解放军以后出现的新的革命措施，则全盘加以否定，说什么“在讲课中片面引用毛主席语录之风盛行一时”，“对教学中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将过去的教学经验，一概否定，对新花样则竞相摹仿”，“在教学方法上机械套用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教学问题举手表决”，“重大改革不经过试点就全面铺开”，“对原有教材乱扣政治帽子，一概否定”。总之，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迫使学校又回到老路上去。

第三、掩盖高等学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为了实现资本主义路线，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极力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最近几年来，杨秀峰、蒋南翔之流，正是使用了这样的伎俩。在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文件上，明里冠冕堂皇地写上“高等学校还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词句，而暗地里却另是一样。蒋南翔在1964年的呼和浩特会议上，竟然说什么：“我们学校与文艺界帝王将相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不同。”“这几年成绩是主要的”，“什么都今是而昨非不行”。企图抹杀阶级斗争。更为严重的是，他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把矛头直接指向毛

主席，说什么：“看不到成绩就是黑格尔哲学，不能前进了。”同年的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上，蒋南翔又纠集了一批人，压制对高教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揭发，叫嚷什么：“《高教六十条》是辉煌的文件。”“60年以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执行中产生的问题。”“主席春节指示以来，成绩也是基本的”。他竟凶狠地企图把会上揭高教战线上阶级斗争盖子的某些人，打成“反党分子”。他为了转移视线，又使出新的花招，提出了所谓破苏联框框的问题，想把高等学校中尖锐的阶级斗争缩小为仅仅是“破苏联框框”，妄图给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掩护，逃避自己被揪的命运。

第四、否定政治挂帅，

宣扬“政治落实到业务”的修正主义观点

蒋南翔一贯贩卖“政治落实到业务”的黑货。他在呼和浩特会议上公开宣扬说：“学校里一要政治挂帅，一要教学为主，‘挂帅’是使‘为主’更好些。”“教学为主，就要提高教学质量。”“当然，政治质量要提高，可是，业务质量也是要的。”一直到1966年的济南会议上，蒋南翔还露骨地说：“石油部出个大庆，小厂出了尖端产品，才能认为它政治挂了帅。”在这些谬论的影响下，高等学校的政治教育，长期以来，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思想工作一直非常薄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状况，一直极为落后。

高教部对于师生的革命化和劳动化，抱着消极的态度，过问得很少。学生参加“四清”的问题，不仅迟迟不作决定，而且蒋南翔等竟然决定理工科学生参加“四清”限制在6至10周内，直到毛主席明确指示学生要参加一期“四清”后，才不得不改变这一决定。对于教师下厂劳动锻炼，高教部对已下厂的，竟然先规定劳动不得超过两个月，直到1965年5月，下厂教师强烈反对以后，才延长了参加劳动的时间。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的十七年，在高教战线上，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肆泛滥的十七年，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十七年。在这十七年

中间，毛主席对教育工作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都遭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致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得以长期统治我们的学校，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恶浪。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毛主席都亲自点燃起革命的火焰，给反革命复辟活动以致命的打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丧钟敲响了，他们一个个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特别是挖到了修正主义的总根子刘少奇，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过去，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刘少奇是代表人物，邓、彭、陆、杨、蒋等是刘记黑司令部的重要干将。他们的罪恶必须彻底清算！他们的流毒必须全部肃清！十七年来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和扫除！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打倒彭真、陆定一！打倒杨秀峰、蒋南翔！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1966年12月10日初稿

12月29日修改

摘自 高教部、教育部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编印

《斗批改通讯》第三期 1967年3月28日

【资 料】

刘少奇的黑手伸向教材编辑工作一例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二战斗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黑手伸得很长，连中小学教材也紧紧抓住不放，大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阴谋利用教材作为渠道，向学生脑子里灌输剥削阶级思想，造就资产阶级接班人，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力量。

关于政治课教材，刘少奇闭口不谈要编选毛主席著作，引导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而是强调要教学知识。早在1951年3月，他在对中等教育会议的黑指示中，就大肆鼓吹“政治课内容要讲比较完整的政治知识”，根本不谈政治课教学要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促进学生思想革命化。把一门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的学科，篡改成教学知识的学科。

刘少奇公然主张用封建士大夫编著的浸透剥削阶级思想毒液的东西做教材，用它去毒害学生。1956年3月6日，他召集教育部一些人汇报工作。当谈到教材问题时，他不谈要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编写思想性强的新课本给学生读，居然吹捧封建士大夫著作，要用那些东西做教材。他说什么“办学校要有教材，如历史，没有新的，《资治通鉴》也可以读”。甚至认为可以读《圣经》，学宗教的“教条”。他说什么“‘教条’要学，《圣经》要读，问题在于运用。”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毒害青少年之心何其毒也！

刘少奇还极力贩卖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的黑货，主张把苏联学校的教材照搬过来。1951年3月，他在对中等教育会议的黑指示中，就极力主张我们的教材要“以苏联课本为蓝本”。

从上面揭发的情况可以看到，刘少奇对于编辑教材的主张，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烩。

多年以来，教材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之所以没有被铲除，剥削阶级的思想之所以能自由泛滥，地主资产阶级的黑货之所以能占领无产阶级的讲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毒液之所以能通过课堂教学阵地往学生脑子里灌输，其罪魁祸首，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

1967年1月4日

摘自 高教部、教育部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编印

《斗批改通讯》第三期 1967年3月28日

【资料】

刘少奇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根子

——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 160 例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小米加步枪》战斗队

中宣部彻底摧毁阎王殿革命联合委员会教育批判小组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改资料组

前言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被揪出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上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复杂的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一贯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提出并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总头目刘少奇，对全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当前，我国正开展着一个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群众性运动。亿万革命群众口诛笔伐，在各个领域里向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发起了总攻击。在教育战线上，我们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彻底砸烂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摧毁反动的旧教育制度，大立毛泽东思想，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为了配合当前的斗争，我们编选了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部分言行，并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加以对照、批判。这些材料，是刘少奇猖狂反对毛

泽东思想的铁证，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

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战斗的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战斗旗帜，勇敢地投入到这场大斗争、大批判的革命洪流中去，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教育阵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一、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言论 （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还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没有学习、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学习毛泽东思想，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人已经学过马列主义著作的，要继续学习；还没有学过的，那就要学习几本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 （1951 年 11 月 4 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 （2）（马列主义）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看，是错误的，是机械唯物论。 （1966 年 6 月，对民主人士的讲话） （3）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现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大有人在。 （1964 年 9 月，给江渭清的信） （4）现在学习毛选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这样下去会弄虚作假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千万字的读书笔记，千万不要宣传。 （1964 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指示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 （林彪，转自肖华同志在空军干部会议上传达林彪同志的指示，1966 年） 主席对问题有全面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6 年）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转自《肖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1966 年 1 月） 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966 年 12 月） 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态度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的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
---	---

(5) “认真学习毛著”不完全正确,不能把毛主席著作当成教条,要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要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

(1964年9月,给江渭清的信)

(6) 党员课本要通俗一点……,不要摘引毛主席的话当作课本上的话说。

(1962年11月21日,接见中组部、各中央局组织部正副部长的讲话)

(7) 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外国的经验,世界革命的经验。……有人认为……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1948年12月14日,对马列主义学院学员的讲话)

(8) 我想,我们不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基本的知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相当困难。

(1948年12月14日,对马列主义学院学员的讲话)

(9) 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首先要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请教,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我们也要认真地阅读反面教员提供的材料……当然,也要读现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

(1963年6月,在河内阮爱国党校的讲话)

(10) 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只学毛选不行,还要学习马列主义。

(1965年7月20日,在农业部汇报农业教育工作时的“指示”)

(11) 政治课的内容,要讲比较完全的政治知识,如联共党史中最主要的内容,如哲学的问题……。

(1951年,对中学教育会议的“指示”)

(林彪同志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阶段的指示,1966年10月)

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林彪,转肖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1966年1月)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

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

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

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

(林彪同志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阶段的指示,1966年10月)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

(同上)

搞什么“完整的”、“系统的”学习,而不联系实际,学习得个五分,可是品行常常很坏,行动可以犯罪,行动可以得零分,得二分,得三分。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

(12)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学时不一定多。……主要是在用的时候学。

(1966年7月18日,在教育改革会议上的讲话)

(13) 许多制度,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等,都是资产阶级留下来的,我们没有好好去考虑。根据我们的可能性,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指示,这样来考虑我们的安排……。

(1965年11月19日,谈话记录)

(14) 一九六〇年刘少奇对十七届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团讲话时,革命师生提出,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情绪很高,但是,买不到《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避而不答群众这个强烈的要求,却别有用心地说:“这是纸的问题,纸要分轻重缓急,排个队。教科书一定要保证,一定要用好纸,白纸。”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大提倡读书,养成读书的风气。必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林彪,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966年12月)

二、刘少奇对抗和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15) 这次提出教育方针来讨论很重要,过去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不明确,要进行批判。

(1958年6月11日,董纯才传达刘少奇对教育工作的“指示”)

(16) 过去(教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严重的。在一个时期有方针性的错误。相当长时期方针不明确,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路线。……

(1958年6月2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7) 什么叫人的全面发展呢?第一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全面发展,当然也还有其它方面的。如果脑力劳动者只搞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只搞体力劳动,那还有什么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我们的方针正确,只是方法不对。课程多,考试方法是摧残青年的方法,我很不赞成。现在学制、课程、方法都要改。

1964年春节谈话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的全面发展呢？ （1964 年 8 月 7 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8）高级党校的办校方针应该是认真学习，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自己思想的方针。 （1956 年 7 月，在高级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以前执行工农教育的方针是有偏差的，今后应加强工农业余教育，工农速成中学可暂停招生，要求三年速成不是实事求是的，学习上不能取巧，要老老实实，也不能降低要求。 （1955 年 5 月 16 日，参观清华大学时的讲话） （20）我们要大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过去曾有教育救国论，那时教育救不了国，现在就需要教育救国了。 （1952 年 8 月 26 日，在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为抗大题词》（1939 年）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论联合政府》
---	---

三、刘少奇抹煞阶级斗争，放弃党的领导，

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美化资产阶级，混淆阶级界线，大搞阶级调和 （21）劳动者有两种：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因此被雇用的职员也是，教员也是，……中小学教员也是，大学教授也是，工程师、新闻记者、艺术工作者中很多也是，唱戏的（其中包括吹鼓手）也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出卖劳动力，都是工人阶段……，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 （1949 年 10 月 11 日，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22）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是为了别人服务的。地主资本家没有了，你们难道不	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1962 年 1 月 30 日）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及主要团员时的谈话（1964 年 9 月 4 日）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
---	---

就是为工农服务吗？

（1957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23）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

（1956年9月，“八大”政治报告）

（24）你来信中说中国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从解放以来，是逐步认识和接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经过了几个认识阶段，最后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这是真理。

（1959年11月28日，给黄炎培的信）

（25）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为人民服务，贡献给国家、人民，这样的人不少。

（1957年12月13日的讲话）

（26）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比其他阶级高，主观世界改造是可能的。

（1960年2月12日的讲话）

（27）资方人员很多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须认真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有益的经验 and 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

（1956年9月，“八大”政治报告）

抹煞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28）大的运动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所以需要调配大批干部投入经济建设中去。我们国家建设的两项主要工作，一项是经济建设，一项是文化建设，这两项工作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

（1952年8月26日，在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29）革命是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在中国，……只剩下个资产阶级，对

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

《1957年夏季形势》

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知识分子……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

转摘自《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他是有办法的，可以教育改造。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建设，是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1952年暑假对留苏学员的讲话）

（30）如果我们讲到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讲到农民阶级的思想，讲到地主阶级的思想，是讲过去的，是反映了那个阶级存在的时候。

（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31）在思想上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有很大不同。他们之间对抗，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者，可是，你看不起他，他就反抗你。帝国主义者看不起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就反抗他。

（1949年10月11日，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32）因为他们（指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对抗，是思想上的对抗。把旧的观念改变了，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苏联的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就没有这种对抗的情绪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界限逐渐清除了。

（1949年10月11日，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33）如果旧知识分子反对消灭这三个差别，就没有力量。他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多大的号召力。我们总是怕旧知识分子、旧教授反对我们。他们反对消灭三个差别，力量不够。

（1964年8月，在广西干部会上的讲话）

（34）……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国外的现代修正主义，要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深入到各方面去，深入到政治、哲学、经济、文学等各个领域中去。这样做……使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发生很困难。

（1963年11月13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否认党的领导，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

（1949年9月21日）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们的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

(35) 在学校决定一切问题的是教员。 (1956年6月,对高教部的“指示”) (36) 目前在高等学校工作中,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注:所谓“校务委员会”,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刘少奇通过这一规定,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1961年9月15日,刘少奇、邓小平盗用中央名义颁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高校六十条的“指示”) (37) 开开会,发现干部,总结经验,这就是体现党的领导。发现优秀教师、校长人材是领导的主要任务。 (1956年6月,对教育部的“指示”) (38) 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1956年9月,“八大”政治报告) (39) 一万年以后,忽“左”忽右也会有,今后学校要有稳定性。学生要向先生学习,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承认后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比前者高。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教育工作时的讲话)	《工作方法 60 条(草案)》 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 一是党委领导; 二是群众路线; 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 天津大学视察时的指示(1958年8月)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十六条》 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须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转摘自 1967 年 1 月 23 日《解放军报》
---	--

四、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百般

抵制和疯狂破坏教育大革命

恶毒歪曲文化革命的目标

(40) 我们的文化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在全国城乡广泛地发展中学教育，积极地发展高等教育；完成尚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创制工作，同时，积极进行汉字的文字改革；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几百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1958年5月5日，在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41) 六小时工作，人们就有了读书的时间，每天有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的读书，全民读书，那时才是真正的文化革命。

(1960年5月26日，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的讲话)

否定抗大式学校的革命传统、全盘继承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42)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所没有过的大学。

像中国人民大学这种新型大学，在全国只是第一个。华东、华中、华南都有大学，这些大学都是政治训练班的性质，……要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但这不是在半年内可以培养好的。

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

(1950年10月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43) 中国过去的大学是否有成绩呢？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

《新民主主义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8日)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抗大三周年纪念》(1939年5月30日《新中华报》)

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

在对于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认识水平上是有成绩的，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没有成绩，那末也就是否认了大批工作者努力的对象。

（1950年10月3日，在中国人民
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44）对旧大学的改造，就要慢慢地、有步骤地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来改造。

（1950年10月3日，在中国人民
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45）剑桥大学，那是伟大的科学之府。

（1957年5月1日，对英国剑桥
大学一经济学家的谈话）

（46）没有他们（指苏联）的帮助，我们的大学是办不好的。不学习苏联的教育，就得不到这么多新的知识。世界上只有苏联有这些新知识的经验。

（1950年10月3日，在中国人民
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47）那边的大学（指苏联），一般比中国办得好，办得切实些。因此，要求你们到那里去好好学习。

（1952年暑假对留苏学员的讲话）

（48）（教材要以）苏联的课本为基础。

（1951年3月。对教育部“指示”）

（49）实行这种制度（苏修学衔、学位制——编者）是必要的，既要人家安心工作，

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

《苏维埃区域的文化教育》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新民主主义论》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主席诗词《满江红》（1963年1月9日）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

《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你们的教育部是中国的教育部还是苏联的教育部，如果是苏联的教育部，我就要取消你们的教育部。

对七省市教育厅、局长的谈话纪要（1957年）

在教育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学校要正规化，需要采取这样的一些制度才能使人们树立起教学理论工作的事业思想。

（1954年）

（50）应该多派一点助教去留苏，将来他们也可以变为教授。

（1955年5月16日，刘少奇参观清华大学情况简报）

（51）如果有五千个从苏联回来的学生送到工厂里去，就会使工作少犯错误，提高生产，本钱就捞回来了。

（1952年7月29日，对留苏学生的谈话）

（52）在全党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全体党员和干部都应该学习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1961年6月30日，在庆祝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恶毒攻击 1958 年的教育大革命

（53）（搞半工半读）以前的学生不通，就让他们念全日制毕业，……现在这一批让他们念算了，……不愿意废除的就可以不改，一部分不愿意改的，就改一部分，……大学的教员就算了，不通的也可以保留下来，还是思想问题。

（1958年5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54）大跃进以来的思想文化革命是乱戴帽子、乱斗争，强制人家接受马列主义，前几年是抽象的红，空谈革命、革命。

……不要欠账到棺材，生前不还死后还。（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账”）

（1961年7月6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

（55）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上，刘少奇伙同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大肆攻击一九五八年以来科学文教战线的大革命。刘少奇公然提出“究竟成绩是否伟大？有无虚假？”污蔑我党“不懂装懂”，“就

者这个教育方针，极力反对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宣扬苏联修正主义的一套教育“理论”和制度。他们拼死命地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妄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红旗》1966年第八期社论

对于外国文化，……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论联合政府》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中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是怕实事求是”。

（1961年7月6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会上的讲话）

（56）从一九五八年起，三年以来，……我们的工作中同时也发生了不少缺点，主要的是：（一）数量发展过快。（二）同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特别是同老教师的团结合作，在很多学校被忽视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简单的作法，因而影响了一部分党员的积极性。（三）劳动过多，科学研究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对课程的不适当的大合大改，……以及学校工作中的其他缺点，使有些高等学校一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降低了……

（1961年9月15日。刘少奇盗用中央名义颁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高校“暂时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

顽固对抗毛主席近几年来
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

（57）教育部必须抓教员、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目前各方面还是不定型的，长期不定型不行。学制不定型，课程不定型，教材不定型，学校就不能稳定。

（1965年3月，在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上的讲话）

（58）教育制度必须五年才能初步总结经验，十年才能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的报告）

（59）现在我们全日制的小学、中学、大学还不能减少。照现在这样办还是必要的。

（1964年8月，在广西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60）全日制学校的改革也要抓，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去年春节就提出来了，还没有解决，还请高教部准备如何改革，看不准，千万不要瞎指挥。

（1965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1）（半工半读）时间可以比全日制学校长半年或一年，课程不要缩减得过多，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1955年）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实践论》

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1964年春节谈话

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很重。

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1964年春节谈话

教育内容也要精简，重要的东西不在多，而在反复的学，学会运用，多讲不如多练。少而精的精，就是要求抓住精华，学得精通。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

真正能学到些东西，才能有威信。

（1965年3月，在全国农村半工半读教育会议期间的谈话）

（62）教学年限，我认为不好规定死为几年，要规定总学时，学完就行，年限可长可短，五年也可以……大学、中等技术学校到底学多少年就够了？要按学时算，该几年就几年。总之，质量不要降低，降低人家就说话了，不要死规定几年，必须学完那些课程。

（1965年7月20日，关于农业教育工作的“指示”）

（63）（学制）不要规定的太死。要按学时规定，学不完，时间延长一些，多个一年半没多大关系。按总学时，看要学习几年。功课要学完，学好。

（1965年7月20日，在农业教育半农半读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64）教学年限，我主张不好规定死为几年，要规定总学时，学完就行，年限可长可短？三年可以，五年也可以。

（同上）

（65）参加了四清，耽误了一年，就补他半年一年。不要硬挤时间，要把课程学完。

（1965年7月20日，关于农业教育工作的“指示”）

（66）参加一期四清，毕业延长一点，补起来，当兵二个月可以不当了。不要因参加四清，学习质量降低。

（1965年7月20日，关于农业教育工作的“指示”）

（67）现在看来，小学教员和教材，问题不大。……原来的全日制中小学教材，也还可以要。

（1965年，在半农半读会议期间的讲话）

（68）课程不能消减过多，要真正学点东西，要比全日制还好。

上的讲话，1960年9月）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

《十六条》

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真是害死人。

……

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

在杭州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

学制要改革，时间不要太长。干部老住学校，就会脱离实际，越学越空。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9月）

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中去搞四清……，而且还要去工厂搞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7月5日）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1964年春节谈话

许多人都想多学一些东西，想学许多的科目，想什么都学得完备，但是结果相反，学到的东西却很少。

（林彪，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全校干部会议上的结论，1938年5月）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在城市学校半工半读会议期间的讲话)

(69) 全国农业半工半读会议向刘少奇汇报时,谈到毛主席“七三”指示,当时高等农业院校的基础课、专业课,总的一般可以砍掉三分之一。刘少奇听到这里,叫道:“应该增的还是要增!”

(1965年7月20日,在农业教育
半农半读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70) 最近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上写了,以学为主,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就是要劳动。

(1966年7月18日,在教育改革会上的讲话)

(71) 学制要缩短,如何缩短?
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大学五年也可以……也不能搞的太短吧。

(1966年7月18日,在教育改革会上的讲话)

(72) 现在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是全日制学校如何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政治、生产都好解决。

(1966年7月18日,在教育改革会上的讲话)

千方百计抵制教学改革

(73) 学校要用正规的办法,要考试,将来毕业,要准备这一着。……初级、中级的党校、也要一步一步地正规点,办下去。

(1948年12月14日,对马列学院
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74) 有的同志认为规定的书太多了,读不完,我以为最好还是把它读完,紧张一点。

(1948年12月14日,对马列学院
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七·三”批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

六年改为三年,这样作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和毛远新谈话(1964年)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十六条》

现在这个办法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是对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停止。

1964年春节谈话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关于课程、讲授、及考试方法的批示》

(1964年3月10日)

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也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

(75) 办学要有教材，如历史，没新的，《资治通鉴》也可以读。教条要学。圣经要读，问题在于应用。

(1956 年 3 月 6 日，在教育部汇报会上的讲话)

(76) 对学制问题，以三年为好，目前需要干部，早一年毕业是可以的。当社会需要不那么急，中技学生多了的时候，将来是否可以搞五、六年，七、八年，办成大学，让学生多学一点，不要学成半吊子。现在学两年出去，还要上夜大学，出去生产，在这里也生产，与其出去学，不如学校学好。

(1958 年 10 月 26 日，刘少奇视察
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时的谈话)

(77) 好啊！保留北京大学，保留个尖端，让它去修正主义好了。

(1965 年 11 月 3 日，谈话纪要)

(78) 重点学校有的是办得好，有历史，积累了经验、资料，不要搞掉了，不要把突出成绩搞掉了，只要做到这一点，大的偏差不会出。

(1966 年 7 月 18 日，在教育改革会上的插话)

(79) 培养人材是长期的困难的事情，先办好几个重点学校，对高等教育是很重要的。

(1959 年 5 月 16 日，参观清华大学时的讲话)

挖掘、考古。……钻到古书堆里，越学越没知识。

与毛远新谈话 (1964 年)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在杭州的讲话 (1965 年 12 月 21 日)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所控制的一些学校，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他们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动的顽固堡垒。

《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
修正主义路线》《红旗》1966 年第九期社论

(未完待续)

摘自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学批判》编辑组 1967 年第 3 期■

【读者来信】

1. 阿陀自我正误

第125期刊登我采写的《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因为本人疏忽大意，出现三处不应该有的时间错误，特更正如下：

(1)、37页“68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应改为“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

(2) 41页“六七年七月我也到了北京”，应改为“六八年七月我也到了北京”。

(3) 45页“赵紫阳秘书1974年曾经告诉我，总理去世前……”，应改为“赵紫阳秘书曾经告诉我，1974年（75年？），总理去世前……”。

2. 庞国义纠错

125期有几处笔误或录入错误：

1. 第37页，倒3行：“1968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应为“1969年”；
2. 第54页，顺15行：“当年有个越南电影《寂静的山林》”，似为中国50年代的反特故事片（王心刚主演），是否有相同名字的越南影片，不得而知；
3. 第55页，倒4行：“破坏金婚犯某某某”应为“军婚犯”；
4. 第77页，顺11行：“刘福禄的革命案件”应为“刘福禄的反革命案件”。

2015-03-01

3. 予庆指谬

阅125期《记忆》《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一文，有两点订正或补充：

一，武文中1968：“7·25中央接见广西两派，会上就大讲韦国清上报的黑材料，……。当时韦国清是政治局委员”据记载，其时韦并非政治局委员，他是在五年之后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

二、武文中：“1968年‘7·3布告’和‘7·24布告’之前，两年文革，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和地区，军队都严格执行不准开枪的命令”。需要指出的是，

在1967年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青海西宁“二·二三”事件、8月宁夏青铜峡事件中，都曾发生部队开枪情形，虽然这些事件的起因各有不同，但都不幸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2015-03-05

4. 张晓良感想

读启之文，敬佩胡杰。看过他的《我虽死去》，原来他还是一位版画家。若有胡杰“大饥荒”系列版画，烦请转发几张电子版。

《冷卫口述》中的毛选和毛主席像的最终用途，令我联想到两则阅读记忆：某知青回忆文章，下乡教贫下中农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后听某贫农大爷唱的是“打开房门靠左手”，与原词谐音；另一知青老是一人哼唱《我送报刊走得忙》（乘东风迎朝阳，报刊杂志我车上装，邮递员这工作可不平常，把毛泽东思想传四方……），一农民问你为啥老唱“报刊杂志扯上床”？

2015-03-07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